

# 红旗

○  
HONGQI

一九六二年 5



#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二年第五期 ★

## 目 录

刚果的形势说明了什么 .....郭济洲 吴 休 (1)

奴役, 还是进步? .....陈 原 (8)

肯尼迪与牛奶 .....岑 桑 (11)

关于认识中的肯定否定问题 .....樊育之 (13)

——谈太阳系学说的一段历史

我们的时代和卡德尔的“辩证法” .....吴 江 (17)

新老渔翁四钓鱼(漫画) .....华君武 (5)

☆ 三月一日出版 ☆



# 剛果的形勢說明了什麼

郭濟洲 吳休

美帝國主義打着聯合國的旗幟鎮壓剛果的民族解放運動，加緊對剛果進行侵略，使剛果形勢不斷惡化。一年以前，剛果民族英雄盧蒙巴慘遭美、比帝國主義殺害，現在，剛果民族主義領袖基贊加的安全又遭到嚴重的威脅。美帝國主義對它利用聯合國推行新殖民主義自以為很得計。肯尼迪在今年的“國情咨文”中，對美國利用聯合國扼殺剛果民族獨立作了一番無恥的吹噓。他說：“在十八個月以前，紛擾動亂的剛果向聯合國提出了它所遭到的最嚴重的挑戰。前景是一團混亂，或者是大國實行某些對峙，包含各種料想不到的危險。今天，在一個統一的剛果境內取得和平和解的希望增加了。這正是我們政策的一個目的。”肯尼迪對剛果形勢的描繪，完全是一派帝國主義的胡言亂語。但是，剛果的形勢的確可以說明美國利用聯合國做工具的政策實質，這是值得人們深思的。

剛果人民從十五世紀以來，不斷遭受到殖民主義的侵略和奴役。近八十多年來，剛果淪為比利時的殖民地。多少年來，剛果人民為了祖國的獨立，進行了英勇頑強的鬥爭，終於在一九六〇年六月三十日宣告獨立。剛果的獨立並不意味着殖民主義勢力已經心甘情願地退出剛果。比利時殖民者雖然被迫同意剛果獨立，但是，它的殖民軍隊卻不願意

撤退，它在剛果的經濟利益仍然全部保持，它還千方百計地在剛果民族內部製造分裂，以便採取變相的形式，維持它在剛果的殖民統治。覺醒了的剛果人民要求實現真正的獨立，他們喊出了“由剛果人管理剛果”的口號。緊接着剛果宣布獨立之後，剛果的愛國軍隊和人民一起，展開了驅逐比利時軍官的鬥爭。當比利時殖民者對剛果人民進行血腥鎮壓的時候，剛果愛國軍民立即投入了反抗侵略者的武裝鬥爭，表現了英勇不屈的堅強鬥志。儘管比利時侵略軍出動了飛機，甚至使用了火箭，但是剛果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展開了英勇的抵抗，曾在許多地方擊退了侵略軍的進攻。當時，剛果民族解放運動蓬勃發展，前景充滿了光明和希望。對於剛果人民有利的形勢，帝國主義者是不喜歡的。所以，肯尼迪的“國情咨文”把剛果當時的形勢描繪成為“紛擾動亂”、“前景一團混亂”。

美國在剛果有着巨大的經濟利益。在剛果淪為比利時殖民地的初期，美帝國主義的殖民勢力就已經滲入剛果。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壟斷資本更加積極地向剛果進行擴張，到剛果宣布獨立的時候，美國在剛果的投資已達六億美元，僅次于比利時而居于第二位。美國幾乎壟斷了剛果戰略原料的全部出口，剛果出產的鈾礦砂的百分之九十以



上和钴矿砂的全部都运往美国。美国在刚果的利益是它决不願意放棄的。而且，由于刚果在非洲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美帝国主义一向把刚果当作重要的侵略基地。美帝国主义显然知道，刚果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发展，必将对非洲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如果刚果获得真正的独立，新老殖民主义者不仅将丧失在刚果的殖民利益，而且它們在整个非洲的殖民統治，必将更加迅速地陷于进一步的瓦解。肯尼迪把十八个月前刚果的形势說成是“前景一团混乱”，正是反映了美国統治集团当时对美帝国主义在刚果的命运担忧的心情。

美帝国主义决不容許刚果的真正独立。因此，当刚果人民站立起来，要求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就制造各种借口对刚果进行干涉，决心扼杀刚果的民族独立。然而，美帝国主义对于直接出兵刚果不能不有所顾忌。美国《紐約先驅論壇报》供认：美国直接出兵这种行动“只能意味着恢复白人用赤裸裸的强力对付黑人的老办法”，将会引起“最可怕的反应”。于是美帝国主义采用了更为狡猾的手段，以帮助刚果“維持秩序”和实现“統一”为借口，打着联合国的旗帜对刚果进行横暴的干涉。

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联合国軍”是怎样帮助刚果“維持秩序”的呢？

“联合国軍”进入刚果，不但根本没有解除比利时殖民軍的武装，反而同比利时殖民軍达成共同占領刚果的協議。凡是刚果爱国軍队据守的陣地，都相继被“联合国軍”“接管”，并且迫使刚果爱国軍队放下武器。而比利时殖民軍却得到“联合国軍”的百般包庇和纵容。有些比利时殖民軍官因为进行挑衅

活动本已被刚果爱国軍队拘留，“联合国軍”却把他們釋放出来，让他們在刚果繼續为非作歹。联合国当局甚至还大批联合国的臂章发給比利时的伞兵和間諜，以掩护他們进行破坏活动。“联合国軍”和比利时殖民軍很快就勾結起来，一起镇压刚果人民。联合国駐刚果的代表美国人本奇公然宣称，只有“联合国軍”才有权对刚果的安全負責。接替本奇职务的达雅尔更狂妄地叫嚣：“我不能允許像刚果軍队这样一个沒有秩序的烏合之众来控制刚果这个国家。”联合国当局儼然以刚果的統治者自居，它不仅根本不把刚果合法政府放在眼里，而且把刚果爱国力量当做眼中釘，处心积虑要加以消灭。在刚果的許多地方，“联合国軍”多次制造流血事件，肆意屠杀刚果爱国軍民。刚果的爱国力量不断遭到严重摧残，刚果的合法政府被瓦解了。今天的刚果实际上已經处于“联合国軍”的軍事占領之下，刚果的重要城市、港口、机场和交通要道完全控制在“联合国軍”的手中。尽管美国还没有使用联合国托管刚果的名义，但是它实际上已經把刚果当作联合国的托管地。联合国当局一年半来在刚果所作所为，根本不是帮助刚果維持秩序，而是帮助美国在刚果建立新殖民主义統治的秩序。

肯尼迪的“国情咨文”表示，美国政策的一个目的是要实现刚果的“統一”，那么，让我们看一下美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是怎样帮助刚果实现“統一”的吧！

刚果独立以前，比利时殖民主义者为了保持它在刚果的殖民利益，一向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段，挑唆刚果人自相殘杀。那时已經侵入刚果的其他帝国主义势力，也都各自扶植自己的走狗，在刚果的封建部族之間制



造糾紛，破坏剛果的團結，以达到它們侵略剛果的目的。剛果人民对帝国主义在剛果长期制造紛乱和分裂的局面深恶痛絕，他們十分迫切地期望驅逐在剛果的殖民主义势力，使自己的祖国成为一个独立和統一的国家。剛果宣布独立后，以卢蒙巴和基贊加为首的合法的中央政府，展开了維護独立和統一的英勇斗争。剛果爱国军队曾攻下帝国主义走狗卡隆吉叛乱集团的巢穴巴克旺加，并且向帝国主义的另一名走狗冲伯控制下的加丹加展开勇猛的攻击。当时在剛果人民面前展現出一幅趋向統一的光明前景。

但是，在一九六〇年八、九月間，正当剛果爱国军队向卡隆吉叛乱集团进军的时候，“联合国軍”竟命令剛果爱国军队停火，在开赛省的“联合国軍”甚至强迫討伐卡隆吉叛乱集团的剛果政府军队撤走。因此，本来已經奄奄一息的卡隆吉集团的殘匪又重新集結起来，向剛果政府軍反扑。美帝国主义对于冲伯集团的分裂活动，更是极力支持。一九六〇年八月，联合国駐剛果代表美国人本奇进入加丹加以后，很快就同冲伯勾結起来。“联合国軍”同冲伯集团达成協議，共同鎮压加丹加省人民反抗冲伯集团的斗争，并且阻撓剛果政府軍向加丹加的进军。与此同时，美帝国主义还暗地里把它的走狗蒙博托同卡隆吉集团、冲伯集团串連一起，結成軍事联盟，共同抵抗剛果政府軍的討伐。在杀害了卢蒙巴之后，美、比等帝国主义分裂剛果的活动更加猖狂。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和四、五月間，先后在塔那那利佛和科基尔哈特維尔举行的两次“圓桌會議”，就是它們利用剛果內部各种反动势力制造分裂的突出事件。塔那那利佛會議通过了一个把剛果組成“邦联”的決議，实际上

是要把統一的剛果瓦解成为許多“独立”的小国家。在科基尔哈特維尔會議上，換了一个花样，又說什么要把剛果組成所謂“統一”的“联邦”。“邦联”也好，“联邦”也好，都要求变更剛果以省为行政单位的制度，把省变成邦，也就是变成便于帝国主义宰制的小国家，这都是帝国主义玩弄分而治之的鬼把戏。

这些事实充分证明：美帝国主义打着帮助剛果实现“統一”的幌子，实际上干的是分裂剛果的罪恶勾当。

当然，美帝国主义的确也想要“統一”剛果，那就是要消灭剛果爱国力量，排除老牌殖民主义者的势力，把剛果完全置于美帝国主义的統治之下。在美帝国主义看来，它要实现这样的“統一”的最大障碍是剛果的爱国力量，因此，美帝国主义派到剛果的“联合国軍”同在剛果的老殖民主义势力很快就勾結起来。为了鎮压剛果人民的斗争，美帝国主义者伙同老殖民主义者，采用各种各样的卑鄙手法，首先是集中力量謀害剛果民族主义領袖卢蒙巴。最近美国出版的《中央情报局内幕》一书供认：蒙博托是中央情报局的一名特务，卡薩武布也是傾倒于中央情报局的人物，美帝国主义顛复剛果合法政府和謀杀卢蒙巴的罪恶活动，就是由中央情报局策划，通过卡薩武布和蒙博托这些走狗去干的。这本书还吹嘘，蒙博托这样的走狗是中央情报局“在对头的时候所找到的对头的人”，并且說什么“卢蒙巴的死澄清了空气，并且造成了一种可以采取統一剛果的步驟的气氛。”这些供认，赤裸裸地暴露了美帝国主义在剛果的土匪行徑。

但是，杀害卢蒙巴，不但沒有扑灭剛果民族革命的火焰，反而激起了剛果人民更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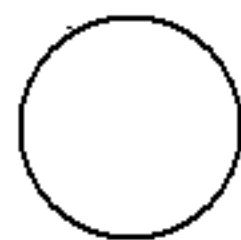
烈的反抗。在这种情况下，美帝国主义转而采取了一手抓军队、一手抓议会的阴险手法：一方面操纵“联合国军”同蒙博托军队对当时刚果合法政府控制的地区实行军事进攻；另一方面，在“联合国军”的“保护”下非法召开刚果议会，采取威胁利诱的手段，分化和瓦解刚果的民族主义力量，扼杀以基赞加为首的刚果合法政府。

美帝国主义勾结老殖民主义者镇压刚果人民，最终的目的为了鲸吞刚果，完全取代老牌殖民主义者的地位，并不是为了帮助老殖民主义者巩固它们在刚果的势力。当美帝国主义自认为在刚果站稳了脚跟以后，它就利用一切机会，加紧进行排挤老牌殖民主义势力的活动，因而新老殖民主义者的矛盾就日益显露出来。

对加丹加的争夺是新老殖民主义者之间最突出的矛盾。无论从经济上或战略上说，加丹加在刚果都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加丹加是刚果最富庶的地区，矿藏不但极为丰富，而且种类很多。它的矿产占刚果全部矿产的百分之八十，它的收入占整个刚果收入的百分之六十。美国《纽约时报》就曾说：“加丹加对能够控制它的财富的任何人来说，是一个大家争夺的好东西。”美国如果控制了加丹加，就有了向中东非和南非扩张的据点；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如果能够保住加丹加，就可以遏止美国向邻近地区的扩张。美国这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大举侵入刚果以后，比利时殖民者感到要原封不动地保持它在刚果的殖民利益已经不可能了，它宁肯被迫放棄其他地区，而要拼命保持它在加丹加的利益，因此极力支持冲伯集团的分裂活动。当联合国安理会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

通过出兵刚果的决议之后，一方面，比利时政府表示同“联合国军”“合作”，以共同镇压刚果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宣称保留单独行动的权利，不容许美国干涉加丹加的“独立”。随后，美帝国主义通过哈马舍尔德宣布“联合国军”进军加丹加，比利时殖民主义者表示强烈反对。一九六〇年八月间，美帝国主义在利用“联合国军”阻止刚果爱国军队讨伐冲伯集团的同时，从比利时殖民者手中“接管”了重要的军事基地，这也引起美、比殖民主义者之间的争吵。美帝国主义一直以“联合国决议”相要挟，但比利时殖民者却始终不愿把它的军队撤走。英国和法国等一些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为了自己的殖民利益，对刚果也各有打算。他们很自然地同比利时殖民者站在一边，反对美帝国主义借“统一”之名，行攫夺加丹加之实。

以美国为一方、以比、英、法等国为另一方的新老殖民主义争夺加丹加的矛盾，在一九六一年的下半年发展到使用战争手段的地步。它们为争夺加丹加，已经打了两仗。出面打仗的一方是由比、英、法控制的冲伯集团和它的外国雇佣军，另一方是由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军”。第一次在一九六一年九月，打了八天，由比、英、法控制的冲伯集团在战争中取得了优势，迫使联合国当局接受了冲伯集团的休战条件。第二次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由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军”又发动进攻，打了十四天，冲伯集团和它的雇佣军遭到重大的损失，被迫向联合国当局让步。经过肯尼迪的私人代表美国驻刚果大使古利昂的撮合，冲伯答应放棄“加丹加国”的称号，承认利奥波德维尔政权为“中央”政权。这样，美帝国主义进一步在加丹加取得了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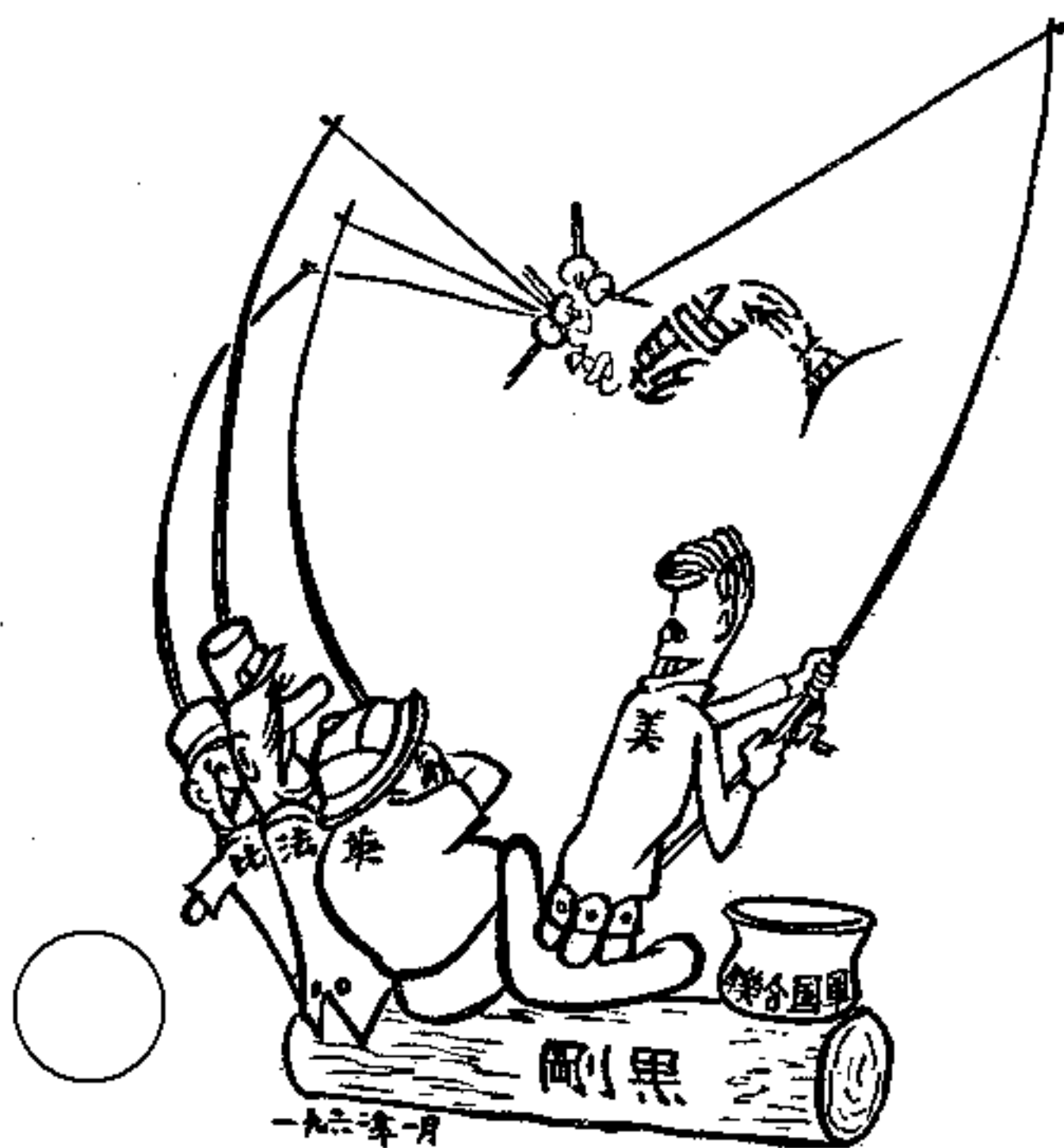


利的地位。这场新老殖民主义者之间排挤和反排挤的斗争，暂时取得了妥协，但矛盾并没有解决。

新老殖民主义者在镇压刚果爱国力量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他们为了维护和争夺在刚果的殖民利益，彼此之间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取决于力量的对比。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们可以取得暂时的妥协，在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时，他们之间的矛盾又会重新尖锐起来。肯尼迪说什么新老殖民主义者之间“和平和解的希望增加了”，显然是自欺欺人之谈。

刚果人民是要求自己的国家的统一的。但是，在这里重要的问题是统一于谁，是统一于人民还是统一于某一个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如果刚果统一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那只是把刚果的民族利益统一出卖给美帝国主义，这决不是刚果人民所需要的统一。

对于美帝国主义叫嚷的“统一”究竟是怎么回事，中国人民有过深刻的体验。中国人民曾经长期遭受好几个帝国主义的分割，遭受由各个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混战的痛苦。中国人民渴望建立一个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美帝国主义也曾以帮助中国实现“统一”为名，支持它的代理人蒋介石集团排挤和消灭其他帝国主义扶植的各个反动集团，曾经一度建立号称“统一”的局面。但是，这种“统一”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任何好处，封建势力仍然各据一方，军阀混战还是连绵不断，人民



新老渔翁的钓竿 华斌

生活依然痛苦不堪。只是在中国人民打败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之后，才在中国大陆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即使到了这个时候，美帝国主义还通过蒋介石集团霸占台湾，并且操纵联合国的表决机器，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利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妄图破坏中国人民的统一事业。中国的经验和刚果的经验都证明，美帝国主义是人民统一事业的凶恶的敌人。

自从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的旗帜侵入刚果以后，刚果的形势就发生了严重的逆转。本来是人民革命斗争蓬勃发展、充满光明和希望的刚果，变成了帝国主义及其傀儡集团镇压爱国力量的血腥屠场，变成了新老殖民主义者你争我夺的角逐场，刚刚取得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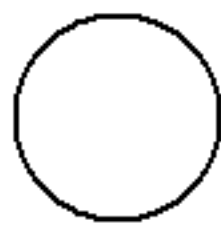
立的刚果人民，又被美帝国主义重新置于水深火热的深渊。回顾一年半来刚果形势的发展，人们可以确定无疑地得出一个结论：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只是美帝国主义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一个工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一贯把持联合国，利用它作为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工具。早在十几年以前，美国就曾经打着联合国的旗帜，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一年半来，它又在帮助刚果“恢复秩序”和“实现统一”的借口下，利用联合国干下了一连串的罪行。美帝国主义明明是卑鄙地利用联合国，来为它推行新殖民主义效劳，然而，肯尼迪却颠倒黑白，说什么其他国家需要联合国来“保护”。他说：“美国不是一个小国。我们可以保卫自己。我认为那些特别要依靠联合国的国家是较小的国家。”肯尼迪的这种说法，欺瞒不了世界各国的革命人民。但是，靠美帝国主义的赏赐过活的铁托集团，却把肯尼迪的话当作无价之宝。铁托曾经跟着肯尼迪学舌，说什么“没有联合国的坚定保证，殖民地人民获得充分独立就非常成问题了。”美帝国主义操纵着联合国所干下的坏事，揭穿了肯尼迪和铁托的这些谎言。

历届联合国会议讨论殖民地人民要求独立的问题的时候，美帝国主义总是千方百计加以阻挠和破坏。就拿最近两年联合国会议讨论的情况来说，可以清楚地看出，肯尼迪和铁托所说的联合国“保卫”小国或者“保证”殖民地人民独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九六〇年，在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讨论“关于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独立宣言”的时候，美国一开始就反对讨论这个问题。美国代表华兹沃斯说，许多民族“还没有作好接受（独立）的准备”，

不能“一夜之间把一个民族从殖民地附属地位转变到……独立的地位”。在最近一届联合国大会讨论殖民主义问题时，美国代表宾加姆竭力为老殖民主义辩护。他把现在仍在对阿尔及利亚和中非、东非人民进行血腥镇压的英、法殖民主义者，描绘成为“迅速地响应了改变的風潮，把权力移交给了殖民地人民”。他还把荷兰殖民者阴谋阻挠印度尼西亚人民收复西伊里安的活动说成是“采取了有远见和建设性的主动”，并鼓吹把西伊里安交给“公正无私的联合国的治理来统治”。一九六一年七月，当联合国讨论英国侵略科威特问题的时候，美国代表公然认为英国出兵占领科威特是“适当的行动”，并认为“这些行动将能使这个地区的和平得到维护”。由于帝国主义的阻挠，这次讨论没有任何结果。也是在去年七月，法国军队对要求收回比塞大军事基地的突尼斯人民进行了血腥的镇压，这一暴行引起各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和抗议，但在八月间联合国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美国代表史蒂文森却说什么“突尼斯和法国都是美国的朋友”，叫嚷要突尼斯人民避免采取“强烈的感情”。最近，联合国讨论安哥拉问题，美国代表又为屠杀安哥拉人民的葡萄牙殖民主义者辩护，说葡萄牙政府在“改变自己的政策”，鼓吹在安哥拉进行“和平改革”，并攻击某些坚持反对葡萄牙殖民政策的代表是“很少强调葡萄牙在非洲存在的积极因素”。

美帝国主义在联合国里面总是用尽一切手段破坏世界各国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的革命斗争。它有时操纵表决机器根本不让这类问题列入议程，有时在不得已要进行讨论的时候，它就千方百计地不让一些正确的提案得到通过，或者指使一些仆从国家提出有利





于帝国主义的“提案”或“修正案”。在美帝国主义操纵的表决机器失灵的情况下，它就用投票权票的方式进行抵制，以掩饰它维护殖民主义的凶相。当被压迫民族要求独立或者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被提到联合国的时候，美帝国主义总是保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利益的立场。铁托集团叫嚷联合国可以“保证”殖民地人民“获得充分独立”，无非是帮助美帝国主义散布对联合国的幻想，麻痹被压迫民族的人民的斗争意志。

虽然有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的阻挠，联合国有时也通过了某些反映社会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提案。这些提案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道义上给予了革命的人民以鼓舞和支持。当然，这些决议代替不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绝对不能设想，只要联合国通过了决议，就可以制止帝国主义的侵略，殖民地人民的独立就唾手可得。因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决不会停止对革命人民的进攻，联合国的决议也束缚不了他们的侵略魔爪。例如，阿尔及利亚和安哥拉等被压迫民族要求独立的问题，在联合国中讨论了多次，也多次作过决议，但是那里的人民仍在遭受着殖民主义者的血腥屠杀。帝国主义决不会因为联合国的一纸决议就给予被压迫人民以真正的独立。阿尔及利亚和安哥拉的人民，正是坚决依靠自己的力量，并且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国际援助，同帝国主义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才使自己的民族解放斗争得到胜利的发展。

一年半来美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侵略刚果的历史，十多年来美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破坏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告诉了人们一个真理：一切被压迫民族不能幻想依靠美帝国

主义及其控制下的联合国“给予”独立，而只有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才能赢得真正的独立。

美帝国主义是被压迫人民很好的反面教员。一年半来，它打着联合国的旗帜侵入刚果，给刚果人民和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又上了新的一课。已故刚果民族领袖卢蒙巴谈到刚果的教训时说得好：“我们非洲人，可能还是非常天真的，可是我们真心相信联合国宪章，并且希望凡是在这个宪章上签字的人都能够遵守它。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们才请求这个国际组织来帮助我们。但是，结果如何呢？……可能这会使我们付出很高的甚至是非常高的代价，但是，非洲将得到教训。她会从这里面学到东西。她将了解，我们的朋友在哪里，我们的敌人在哪里，以及如何分辨敌人和朋友”。卢蒙巴被害以后，刚果的爱国力量继承了卢蒙巴的遗志，坚持着斗争。刚果人民已经进一步觉醒起来。最近，刚果农工工会联合会总联盟总书记阿里阿斯在谈到刚果的形势时说：“假如说，一年多以前在我们刚果还有人曾经把‘联合国军’看做是他们的‘救星’，而在一年多以后的今天，苦难深重的刚果人民已经开始认识到联合国只不过是美帝国主义侵略刚果的工具，认识到美帝国主义是刚果人民最凶恶的敌人。”阿里阿斯的这个谈话反映了刚果人民接受教训、继续斗争的决心。

目前尽管刚果的民族解放运动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今后他们的斗争还会经历曲折艰难的道路，但是，长期身受帝国主义残酷奴役和压迫的刚果人民要起来革命，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实现刚果的独立和统一，终究是任何反动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刚果人民要求独立和统一的愿望最后是一定会实现的。



# 奴役，还是进步？

陈 原

## 一、“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

“脚步要轻盈，巨棒手中擎！”

这是半个多世纪以前，以“挥舞巨棒”在拉丁美洲推行帝国主义政策著称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警句”。

看来，肯尼迪比他的先辈稍微不同些。肯尼迪手中不但擎着巨棒，似乎还举着一把火炬，要来照亮黑夜的道路。何以见得？原来这位总统制成了一个“新产品”，名字叫做“争取进步联盟”，他声称要慷慨地提供为拉丁美洲所需的二百亿美元外来资源的一半——旨在今后十年中“帮助”格兰德河以南两亿人口“自我改革”，“加速他们的经济、教育和社会进步”；或者如肯尼迪的负责亚非、拉丁美洲事务顾问鲍尔斯所说，帮助这些国家“向促进社会正义和有条不紊地政治成长的方向前进”，以便这些国家“可以有最大限度的选择自由”，来“缔造他们自己的独立前途”云云。

中国有句老话：“听其言，观其行。”去年八月，在埃斯特角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泛美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会议上通过的“争取进步联盟”的“宪章”中，列举出了一些诱人的项目。例如，在拉丁美洲国家，十年间每年每人要增加百分之二点五的收入，每个孩子有

机会上四年小学，要有充足的清水可供饮用等等。对于美帝国主义用这些钓饵来引入上钩的手法，连纽约一家自由主义的周刊，也不免说：“联盟者，骗局也。”曾几何时，这个所谓“争取进步”的真面目就暴露得更加清楚了。今年一月，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把他的“盟员”找到还是那个埃斯特角去，这一回谈论的已不是多饮点清水、少喝点污水之类，却是用美元来施加压力，要大家跟着华尔街的指挥棒，唱起绞杀古巴革命的血腥进行曲了。正如《第二个哈瓦那宣言》所说，“美国殖民部长在关着门的令人作呕的秘密会议上用整天整天的时间来战胜某些外长的反抗和犹豫，玩弄美国国库数以百万计的美元做起赤裸裸的买票勾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总共占本大陆人口不到三分之一的国家的一小撮寡头势力的代表不顾一切地作出了决议”，来反对革命的古巴。

难道古巴不正在进行自我改革吗？难道古巴不正在逐步消灭因帝国主义和寡头势力的压榨和迫害而产生的贫困和落后状态吗？难道古巴不是在自由选择自己的独立前途吗？……总之，难道古巴不正在争取进步吗？既然如此，以“争取进步”相标榜的肯尼



迪，为什么对革命的古巴又要大加反对呢？仅仅这一事实，就暴露了肯尼迪的所谓“争取进步联盟”者，不过是从华尔街陈旧的殖民主义武库里搬出来的一根巨棒——只是巨棒的顶端安装上了几个金元而已。

写到这里，有必要提一下美帝国主义所“创造”的许多政治术语，这些术语简直多得令人眼花缭乱。什么“门罗主义”、“保护主义”、“泛美主义”，什么“金元外交”、“睦邻政策”，如今又加上了“争取进步联盟”。狗嘴里长不出象牙来。变来变去，尽管每个政治术语的字眼并不一样，但是，它们无不发出一股血腥的味道。所有这些为了对付拉丁美洲人民所使用的政治术语，本质上总可以概括在美国一句流行的口号里。那就是，他们要实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究其实，也就是：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在华尔街老板们的眼中，美洲人就是美国人，而美国人则决不是随便那一个普通的美国人，而是指的美国垄断资本家们。懂得华尔街这套政治语汇学，举一反三，就可以知道，肯尼迪所创造的“争取进步联盟”，其含义不外是争取美国统治拉丁美洲人民的联盟罢了。

尝了一百几十年“巨棒”滋味的拉丁美洲人民，一下子就看出了肯尼迪这个什么联盟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肯尼迪两个多月前在南美之行中的遭遇就是证明。

尽管这个总统在今年的“国情咨文”中，故作“轻盈”之态，说什么在去年年底那次旅行中，居然发现了大陆南方许多国家对美国“产生了新的信任”。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看看那里的人民是怎样表达他们对肯尼迪的“信任”的吧。

事实是，在肯尼迪还没有到达南美之前，那里就爆发了人民群众的抗议行动。在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各主要街道，出现了五颜六色的标语，写着“要卡斯特罗，不要肯尼迪”、“打倒美国佬”等等口号，那里的学生举行了抗议肯尼迪访问的示威；在波多黎各，大学生联合会谴责说，“波多黎各正在受美国殖民主义之苦”，“肯尼迪的访问主要是继续展开帝国主义向拉丁美洲渗透的运动”，这个组织宣布，肯尼迪是“不受欢迎的人”；在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也发生了反对肯尼迪访问的群众示威……。

这种情况，当然不能不使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大为惊慌。例如，当肯尼迪将要到达委内瑞拉的时候，那里的政府为着避免人民向这位“北方邻人”过分热情地表达“信任”，就忙得不可开交——连忙调来了全国四分之三的陆军共计三万人，拱卫首都加拉加斯；海军陆战队和空军都下了动员令，束装待发；五千名警察全体出动，从机场到城内，每隔二十五呎就站着一个全副武装的军警。这还不够。所有飞机一律不准飞临城市上空，所有街道和广场一律不准三个人以上聚在一起，所有“可疑的”人物通通关在监牢里。这还不够。从“北方邻人”那里又来了大批联邦调查局的特务，一夜之间，委内瑞拉首都的街头就充满了穿褐衫的特种人物。于是，肯尼迪总统和他的随从们才轻盈地（！）乘着几辆特地从美国运来的避弹汽车，在军警特务的围护下，被引导到了总统府。

历史的车轮在前进。四年前，美国前副总统尼克松访问拉丁美洲时，头上脸上吃了



很多很多臭鸡蛋和烂番茄，这证明他那时还敢在人群中“招摇过市”；肯尼迪先生呢，他比尼克松幸运些，没有吃到臭鸡蛋之类的东西，只是他坐的避弹汽车挨到无数石块的撞击而已。至于沿途张贴着的标语，尊贵的总统先生坐在避弹汽车里，不曾看见，这样，他就没有福气去充分享受委内瑞拉人民怎样表达对他的“新的信任”了。

肯尼迪不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吗？在这

里，不妨借用《马太福音》中的一段话：“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当然，“争取进步联盟”这个新殖民主义的“新产品”，不仅是不结果子的树，它还是美帝国主义用以伤害拉丁美洲人民的“荆棘”和“蒺藜”。多谢上帝，人们正在按照肯尼迪所信奉的上帝的格言去办事呢。

## 二、从丰饶到贫困和从贫困到丰饶

当肯尼迪打起“争取进步联盟”的幌子，声称要“援助”拉丁美洲各国“解除普遍的苦难”时，美国《新闻周报》对这个大陆的贫困情况作了这样的描绘：“拉丁美洲的两亿人口差不多有一半是每天晚上饿着肚子上床的；百分之四十五是文盲；百分之五十四缺少清水饮用；百分之四十的城市人口住在破房子里。”

但是，这个贫困的大陆，却是资源丰饶而富足的地区。十多年前，巴西著名的营养学家约瑟·德·卡斯特罗说，拉丁美洲可算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区域之一，因为人少地多，而且土地肥沃；占全世界百分之六的人口住在占全世界适宜居住的百分之十六的沃土上。十五世纪从欧洲来的“探险家”，记录下南美洲“黄金国”的传奇，吸引了许多冒险家到这里来染指。欧洲殖民主义者从中美洲一带肥沃的甘蔗田中“积累”了巨额的财富，有人说，这财富比他们从东方掠夺来的利润还要多。

今天，美国的垄断资本家们在这个贫困

的大陆上所攫取的财富，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殖民者所掠夺的财富都大得多。纽约出版的西班牙文刊物《展望》，曾经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证明了拉丁美洲各国给美国提供了巨量的原料，例如，铜、碘、硝石（智利）、铀、钨、铀（巴西）、铋、铅、羊毛（秘鲁）、石油（委内瑞拉）、硫磺、锡（墨西哥），……都占了美国全部掠夺物的很大一部分。至于咖啡、香蕉、可可、糖，这些热带和亚热带产品，几乎供应了北美洲绝大部分需要。

为什么丰饶的土地却又落到这样贫困的境地呢？美国垄断资本家和他们的辩护士当然不敢据实回答这个问题。在美国国务院做了多年高级官员的一位“学者”——布朗大学名誉校长里斯顿就说过，拉丁美洲的贫困是几乎不能相信的贫困。那么，和谁有关呢？他在题名《革命的时代》的那篇论文里说，拉丁美洲的贫困是因为那里的人民“长年累月的苦恼”所造成的结果。这个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不承认拉丁美洲人民的贫困同美帝国主义有关，编造出这套奇谈怪论，真是抵赖



得太笨拙、太无耻了。

美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制造了贫困、饥饿、死亡，是他们能用任何花言巧语所能掩盖得了的么？听听《第二个哈瓦那宣言》的控诉吧：“在这块半殖民地的大陆上，饿死、并非由于不治之症而病死或未老先衰而死的人每分钟约有四个，每天有五千五百个，每年有二百万个，每五年有一千万个。……与此同时，金钱源源不断地从拉丁美洲流向美国：一分钟约四千美元，一天五百万美元，一年二十亿美元，五年就有一百亿美元。每抢走我们的一千块美元，就给我们留下一具死尸。一千块美元一具死尸：这就是所谓帝国主义的价格。”肯尼迪无耻地声称他那个什么“争取进步联盟”是为了“援助”拉丁美洲人民摆脱贫困状态，而其实，这不过是将掠夺来的利润拿去做本钱，利上生利，循环不已，更狡猾地对拉丁美洲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罢了！

拉丁美洲人民正在以自己的斗争书写自己的历史，争取摆脱由于被美帝国主义的奴

役和掠夺所造成的悲惨境遇。不论美帝国主义使用什么“争取进步联盟”之类的工具来推行它的新殖民主义，都阻挡不了这个历史进程。古巴不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吗？

英雄的古巴人民，不仅以自己的顽强斗争，砸碎了美帝国主义和巴蒂斯塔反动统治套在他们脖子上的锁链，而且，他们正在自己自由的国土上，创造着繁荣、幸福的生活。在短短的三年中，古巴的十多万小农变成了土地的主人，所有的农业工人获得了全年工作的保障，还建立了人民农场和合作社；古巴人民已经把美国在古巴的垄断企业全部没收，实现了大企业的国有化；去年一年，文盲在古巴全国人口中的比重，已由百分之三十七点五下降到百分之三点九；医疗机构增加了三倍……。尽管美帝国主义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扼杀古巴，但是，这个英雄的国家仍然在昂首前进。

从古巴人民那里，拉丁美洲人民已经开始看见了这贫困大陆黎明的曙光。贫困终究会变成丰饶的。

## 肯尼迪与牛奶

·岑 桑·

一月二十三日，肯尼迪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牛奶业和营养大会，并且发表了演说。他向牛奶业巨头们许愿，保证今后在白宫的每一顿餐宴上，都将供应牛奶。这个总统说了许多话，而戏剧性的高潮则是出现在演说快要结束的时候；据美联社报道，这

个总统当场“举杯向听众喝下一杯牛奶。这就是他上台演说的目的”。

原来，美国全国的牛奶消费量，去年又有显著的下降。——“过去一年中牛奶的消费量出人意外地下降了将近三十亿磅，……现在还没有迹象证明，这种消费量下降的情况



在今后这一年将会扭轉过来。”肯尼迪在今年的“农业咨文”中这样說。为牛奶公司老板們的利潤着想，于是，肯尼迪就以总统之尊，做起他們的活广告来，好像別的紳士淑女們在电视台客串什么“我爱可口可乐”、“我爱潘沛依美容霜”、“我爱……”那样。而总统这次表演的是“我爱牛奶”。

本来，美国的牛奶消費量为什么每况愈下这一問題，早就由事实作了解答：由于生活水平下降，有些喝牛奶的人不得不削減掉他們生活中的这个項目。但是，那儿的一些慣于掩耳盜鈴的官員們，却偏偏忌諱这个事实，硬要把牛奶卖不出去的原因，归咎于人們害怕牛奶里沾有放射性微粒云云。肯尼迪总统就是力主其說的。可是，总统的这个有关牛奶問題的答案，到底可以打上几分？在他蒞临美国牛奶业和营养大会演說后的一天，就有了分曉——

一月二十四日，在肯尼迪举行的記者招待会上，一个記者向他提出了問題：“你昨天說应当有更多的人喝牛奶。据我了解的年輕夫妇中沒有一个由于放射性而停訂牛奶的，他們停訂牛奶是由于他們为他們的孩子买不起足够的牛奶，而不是由于放射性。牛油的价格高得已在餐桌上絕迹，而牛奶的价格也是如此之高，因此他們都买不起，可是我們却有剩余产品要我們买来送掉，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肯尼迪显然被这番問話弄得大为尷尬。

他一会儿說，他并不认为包括牛奶在內的消費品銷售量的下降，“可以先由价格来解釋”，一会儿又說，“虽然价格显然是一个因素，却并不是全部解釋”；他一会儿說，自己“不能肯定”牛奶的銷售量“在过去十二个月內下降得很劇烈的整个原因是什么”，一会儿又咬住“放射性”这个答案不放，硬說在牛奶問題上，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人們害怕那里面的“放射性”。为了肯定这一看法，肯尼迪还說：“我正在設法在放射性問題上重新使人放心”；他并举例說，白宫新聞秘書“塞林格先生今天上午喝了牛奶，并没有不良反应”。这样一来，肯尼迪就把那个使他狼狽不堪的难题，支吾其詞地打发掉了。

单在牛奶問題上，就有不少妙事可以归入西方《笑林广記》里去。請看，那些有資格在“每一頓餐宴上”都可以喝上牛奶（而且惠及猫儿和哈叭狗）的亿万富豪，为了榨取高額利潤而千方百計使广大劳动人民陷于赤貧；但是当他們为“过剩”的商品而发愁时，又只好挖空心思幻想赤貧的人們忽然有大把金錢来买这些商品。当他們拚命扩軍备战，需要制造战争恐怖的时候，他們就要让人为的“恐核病”大肆流行，宣傳什么放射性已經如何如何“威胁”到“美国的正常生活”；但是，当他們要大卖牛奶的时候，却又不不得不“設法在放射性問題上重新使人放心”了。……以无法解决的矛盾为其特征的資本主义制度，是不可能不产生这一类笑話的。



# 关于认识中的肯定否定问题

——谈太阳系学說的一段历史

· 龔育之 ·

新旧事物之間、新旧認識之間，总是存在着两重关系：肯定的关系和否定的关系。两重关系，缺一不可。

自然科学的历史，就是人們对自然界的認識，經過无数的肯定否定的环节而向前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絕不可能仅仅是經過單純的肯定的环节来实现的。因为，自然科学的历史，絕不可能仅仅是正确認識的簡單积累和不断被证实的直綫过程，而是充滿着正确的認識和錯誤的認識、全面的認識和片面的認識、深入的認識和表面的認識、普遍的認識和局部的認識等等的不断斗争的曲綫过程，是一切不正确的和不完全正确的

的認識不断被克服、即被否定的过程。沒有矛盾和斗争，沒有否定，就沒有科学的前进，就不会有科学。同时，这个过程，又絕不可能仅仅是經過單純的否定的环节来实现的。因为，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不仅有許多应该被克服的不正确的認識，而且有許多应该继

承下来和积累起来、即被肯定的正确的認識。列宁說：“人类思維按其本性是能够給我們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所构成的絕對真理的。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在給这个絕對真理的总和增添新的点滴……”<sup>①</sup>。所有这些“新的点滴”，在科学的发展中，都不应该拋棄，而必須統統继承和积累起来，并且包含到以后发展阶段的科学內容中去。沒有继承和积累，沒有肯定，也就沒有科学的历史，也就不会有科学。

毛澤东同志說：“对于任何問題应采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又說：“我們許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願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的簡單結論。”<sup>②</sup> 对于自然科学发展中的肯定否定問題，我們也必須有全面观点，必須有“两点論”，避免片面观点，避免“一点論”。

根据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我們对一切学术文化遗产和成果都要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既有否定，又有肯定。对于自然科学來說，就是以实践作为檢驗一切科学理論的标准。凡是經過实践的檢驗证明是正确地反映了客观自然現象和規律的，就加以肯定，反之，凡是經過实践的檢驗证明是錯誤了的，就加以否定。

新旧事物、新旧認識之間的肯定否定关系，具有多种多样的方式。我們不仅要認識肯定否定規律的普遍性，而且要研究各个具体

①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4頁。

② 《学习和时局》。《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942、943頁。



发展过程的肯定否定方式的特殊性。忽视肯定否定方式的特殊性，机械地把肯定否定的某一种方式当作适用于一切过程的方式，是不正确的。

多种多样的肯定否定方式，又可以概括为几种基本的类型。肯定否定方式的基本类型的划分，是一个值得提出来专门加以探讨的理论问题。

研究肯定否定方式的特殊性、区分肯定否定方式的基本类型，对于实践，例如，对于怎样正确地去批判继承自然科学的历史遗产，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里，我们仅就太阳系学说的一段历史，来分析一下肯定否定方式的多样性及其基本类型问题。

从太阳系说的历史来看，有两种类型是必须加以区别的。第一种基本类型是，新认识推翻（否定）旧认识的基础，代之以新的基础，同时又继承（肯定）旧认识中个别的、局部的正确原理。第二种基本类型是，新认识保存（肯定）旧认识的基础，同时抛弃（否定）其中局部的错误的原理，代之以新的正确的原理；或者克服（否定）旧认识的片面性、表面性、局限性，使之发展到更为全面、深入和普遍的新阶段。从旧认识到新认识的无论那一种类型的肯定否定方式，都是认识发展中的质变和飞跃，但是，却是属于不同类型的质变和飞跃。

关于太阳系的科学学说，是由哥白尼所创立的。哥白尼推翻了亚里士多德和托勒玫关于地球是宇宙的不动的中心的错误学说。他指出，并不是太阳同其他行星一道围绕地球转动，而是相反，地球同其他行星一样，

围绕太阳作周年的转动，并且绕自己的轴作周日的转动。

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曾经经历过艰苦的斗争。这个斗争，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科学的宇宙观同宗教的宇宙观的斗争。亚里士多德和托勒玫的学说，当时是反动封建宗教势力所利用和支持的官方科学。反对这种学说，就意味着向教会在自然事物方面的权威挑战，从而会招致残酷的摧残和迫害。所以，恩格斯把哥白尼著作的出版，称为伟大的“革命行为”（《自然辩证法》）。

撇开这一方面的斗争不谈，仅仅从科学认识的方面来说，哥白尼学说也具有深刻的革命性。它打破了人们以直观感觉为基础的传统谬见，从根本上推翻了统治着人们头脑千百年之久的权威学说，还太阳系行星运动以本来面目。在认识发展史上，这也是一个革命性的变革。

哥白尼学说对亚里士多德—托勒玫学说，是一个否定。

但是，亚里士多德—托勒玫学说，在它的时代里，仍不失为一种具有某些相对正确的内容的学说。例如，亚里士多德在科学史上最先确立了地球是球形的科学学说。他曾经指出，月食是月球落在地球阴影以内的结果，月食时月球上暗区的圆形，乃是地球球形的证据。他还指出，在地球表面南北移动时，人们可以看出恒星位置有很大变动，在南方能够看到的某些恒星，到了北方却落到了地平线以下，就看不见了。反之亦然。由此可见，地球不但是球形的，而且对于宇宙空间来说，还是不很大的。

亚里士多德的地球球形学说及其论据，





不仅哥白尼在自己的著作中继续加以引用，就是在我們今天的教科书中，也仍然引用着。

亚里士多德为了反駁地动学說，还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論据：如果地球在运动，那么，从地球上看到远处两颗远近不同的恒星，它們的相互位置应该发生变动。如同我們从行駛着的車輛上看远处两棵远近不同的树，就会發現它們的相互位置发生变动一样。这个現象叫做視差动。人們从来没有看見过恒星的視差动，可見地球是不动的。亚里士多德的結論，我們知道是錯誤的。但是，他所用的論证方法，却是科学的方法。視差动問題成为地动說的拥护者必須加以解决的难题。哥白尼对此作了一个說明，他說，由于恒星离我們太远，这种視差动就观测不出来了。在哥白尼逝世将近三百年以后，亦即亚里士多德逝世大約两千一百多年以后，由于技术的发展，人們终于观测到了恒星的視差动現象，从而最后駁倒了地球不动說的一个有力論据，证明了地动說的正确。

在这个問題上，哥白尼和他的学說的后继者，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結論，但却肯定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論证方法。

由此可見，即使是哥白尼学說同亚里士多德—托勒玫学說之間，也不仅有否定的关系，还有肯定的关系。它們之間的肯定否定关系，属于我們前面提出的第一种基本类型。

在哥白尼之后，开普勒发现的行星运动三大定律，标志着太阳系学說发展的新阶段。

哥白尼的貢獻，主要在于把地球和太阳摆在它們同諸行星构成的天体系統中的正确位置上。但是，关于地球和行星圍繞太阳运动的軌道形状，哥白尼却因襲了从托勒玫以

来的傳統观念，以为正圓形的。而这个观念，是不正确的。

托勒玫学說根本歪曲了地球、太阳和行星間的关系，因此，在解釋从地球上看到的行星运动图象方面，遇到极大的困难。为了勉强湊合观察到的材料，在他的理論中，設計了一个十分复杂的“本輪和均輪”系統。哥白尼学說正确地反映了地球、太阳和行星間的关系，从而从根本上克服了这个困难，使行星运动的图象，得到了很自然、很簡單的說明。

但是，由于哥白尼仍然因襲着正圓形軌道的錯誤观念，在解釋行星运动的时候，他还不能够完全摆脱托勒玫学說的“本輪和均輪”系統，只不过把它們的数目大大减少了而已。

根据哥白尼学說編制的星历表，仍然同观察到的材料有頗大的出入。

列宁說：“無論在自然界或在社会实际生活中，我們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的情形”<sup>①</sup>。在認識領域中，也是这样。

开普勒經過长期仔細的研究，发现行星圍繞太阳运动的軌道，原来并不是正圓形，而是橢圓形。开普勒的这个发现，以及他关于行星运动規律的其他发现，是以哥白尼学說为基础，又克服了哥白尼学說中局部的錯誤原理，使它彻底摆脱了托勒玫学說的陈腐观念和人为的“本輪和均輪”系統的残余，并且进一步发展了哥白尼学說，使之臻于更为完善的境地，取得了理論計算和观测之間的一致。

开普勒学說同哥白尼学說之間，也存在着肯定否定的关系。这种肯定否定的关系，

<sup>①</sup>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8頁。



与哥白尼学說同亚里士多德—托勒玫学說之間的肯定否定关系不同，而属于我們前面提出的第二种基本类型。

从开普勒到牛頓，关于太阳系的学說，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大定律，是描述性的定律。它們完善地描述了行星的运动，但是还没有說明行星运动的本质。它們闡明了行星怎样在运动，但是还没有回答行星为什么这样运动。

从伽利略开始到牛頓来完成的力学学說，特别是牛頓的万有引力学說，进一步闡明了行星运动的本质，回答了它們为什么这样运动的問題。原来，各天体之間，乃至任何物体之間，都是根据万有引力定律相互作用着的。人們知道了太阳和各行星的质量，以及它們相互之間的距离，就可以依据万有引力定律得知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力。知道了这些相互作用力，就可以依据牛頓的物体运动定律，如同計算投石的运动一样，計算出这些天体的全部运动，推知它們的过去，預測它們的未来。这样，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大定律就得到了統一的解釋。它們可以从牛頓的普遍力学定律推导出来。正如恩格斯說的：“在太阳系的天文学中开普勒发现了行星运动的定律，而牛頓則从物质的一般运动規律的观点把它概括起来了”<sup>①</sup>。

牛頓的力学学說，是比开普勒学說更为深入的、具有更为普遍的概括性的学說。

牛頓学說同开普勒学說之間，也存在着肯定否定的关系。在这里，被否定的，并不是某种錯誤的原理（开普勒学說并不是錯誤的，只是对于事物本质的不甚深刻的認識），

而是旧学說的局限性。这种肯定否定的关系，也属于前面提到的第二种基本类型，虽然它又不同于也是属于这种基本类型的、开普勒学說同哥白尼学說之間的关系。

上面我們簡略地分析了太阳系学說从亚里士多德到牛頓的发展历史。当然，牛頓也只是代表太阳系天文学发展的一个阶段，而不是最后阶段。由无数肯定否定的环节联接起来的認識的发展，是没有尽头的。

从这些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在科学发展的各个阶段之間，肯定否定的关系，是普遍存在着的，每一次从旧阶段飞跃到新阶段，肯定否定的方式又都有自己的特殊性。

每次对旧学說的否定，都需要有足够的科学上的理論上的勇气。斯大林說过：“在科学发展史中有不少勇敢人物，不管有何等障碍，都能不顾一切地打破旧說，創立新說。”<sup>②</sup>哥白尼、开普勒这些为科学发展开拓道路的勇士，是我們学习的榜样。

但是，要做真正的科学勇士，不仅要敢于打破旧說，創立新說，而且要善于打破旧說，創立新說。这就是說，不能是凭空的，而必須是牢牢地立足在实践之上的，不能是盲目的，而必須是能够掌握科学发展中破旧立新的規律的。学习馬克思主义辯证法，克服絕對肯定和絕對否定的片面性观点，仔細地研究各个具体发展过程中肯定否定方式的特殊性，注意到肯定否定方式的不同基本类型，克服不作具体分析、不会区别对待的简单化观点，就能够更好地推进科学的发展。

① 《自然辯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頁。

② 《在克里姆林宮招待高級学校工作人員时的演說》。《論列宁》，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3頁。



# 我們的時代和卡德爾的“辯證法”

吳 江

列寧說，修正主義者談論辯證法，只是為了用“詭辯來閹割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精神”<sup>①</sup>，只是為了“取悅於資產階級而無恥地歪曲了辯證法”<sup>②</sup>。過去的老修正主義者是這樣做的，現在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義者也正是這樣做的。

可以拿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義的主要宣傳家卡德爾在一九六〇年八月出版的小冊子《社會主義與戰爭》來做個例子。卡德爾這本小冊子的目的，是為了進一步迎合當時帝國主義組織世界範圍的反華反共反人民運動、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需要，同時力圖賦予現代修正主義的叛賣言論以某種理論的形式。卡德爾在這本小冊子中高談辯證法。他

企圖證明，站在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立場上的人，由於“違反”了列寧的辯證法思想，結果不能不陷入“主觀主義和靜止的教條主義”<sup>\*</sup>；而卡德爾等人則是十分“忠實”於馬克思的“劃時代的科學方法”，特別“忠實”於“列寧整個的思想”，僅僅反對“像斯大林一樣站在反辯證法立場上”的人。卡德爾儼然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捍衛者自許，說什麼反對把馬克思主義哲學拖入“骯髒的政治攻擊中去”，因此覺得“必須在哲學方面來談一談”。

這樣，卡德爾的小冊子也就給了我們一個機會來看一看，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義者如何地歪曲辯證法而替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服務。

## 所謂“通過量的對比的變化”達到“質的對比的變化”

卡德爾企圖加給譴責現代修正主義的人一個罪名，說他們看不到“社會力量在量的對比上的重大變化，他們斷言，這些變化沒有給現代世界帶來任何新的東西”。他在哲學上用了這樣一種特有的表述：“質的對比的變化過程正是通過量的對比的變化進行的。”“對立關係的量變不可避免地反映在這些矛盾各個方面內部的質變上。同時，這些質變又產生新的量的對比。這就是矛盾統一性本

身和對立面內部的鬥爭手段和形式的經常變化過程。”

在這裡，卡德爾把自己裝成是從力量對比的分析出發，並且是用量變和質變的辯證

① 《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寧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1頁。

② 《第二國際的破產》，《列寧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5頁。

\* 本文中凡引用卡德爾的話未注明出處的，均見卡德爾的《社會主義與戰爭》一書。



法来看问题的。

馬克思主义认为，量变不可避免地要引导到质变，量变到达一定点就会引起事物的根本质变；但量变和质变是有区别的，量变不能代替质变。并且事物变化的根据总是在其内部，而不在外部，外部条件通过内部因素而起作用。就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来说，不会仅仅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力量的增强，而不需要经过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决定性的变革，就引起帝国主义状况的根本变化，使帝国主义不再成为帝国主义。同时，在帝国主义内部，也不会仅仅因为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不经过革命的飞跃，就能达到帝国主义制度的变革。卡德尔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混淆了外部条件和内部因素，混淆了量变和质变。他所谓“质的对比的变化过程正是通过量的对比的变化进行的”，“对立关系的量变不可避免地反映在这些矛盾各个方面的内部的质变上”等暧昧的说法，正是说，在外部关系的变化中就有内部的根本变化，在量的变化中就有质的根本变化。这不是辩证法，而是反辩证法的观点。

从反辩证法的观点出发，卡德尔力图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义向人们证明，仿佛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力量对比的变化，已经引起了資本帝国主义世界的根本变化；仿佛由于帝国主义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力量对比的某种变化，已经引起了壟断資本主义的根本变化。尽管卡德尔之流用辩证法的术语，特别是用“量变质变”、“相对绝对”、“可能性现实性”等范畴来装饰自己，现代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这个精制的

观点，是和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对立的。

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内容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声明》对于这几年的主要总结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威力和它的国际影响的急剧增长；殖民主义体系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打击下迅速瓦解；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阶级搏斗日益加剧；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更加衰落和腐朽。在世界舞台上，社会主义力量日益明显地超过帝国主义，和平力量日益明显地超过战争力量。”这也就是说：东风日益压倒西风。帝国主义一天一天烂下去，我们一天一天好起来。帝国主义的日子已经不长。但是，《声明》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没有改变。”帝国主义仍然是帝国主义。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还在实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还力图保持旧的殖民障地，并用新的形式推行殖民主义，对内则加重剥削和推行法西斯化。帝国主义决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实际生活迫切地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工人阶级、反帝民族运动、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一切和平战士日益紧密地把力量联合在一起，采取坚决的行动，以防止战争和保障人们的和平生活。实际生活迫切地要求一切革命力量进一步团结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是这样观察当前的时代的，就是这样估量帝国主义的状况和命运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怎样呢？在卡德尔等人看来，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他们认为，今天由于



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世界正从两方面发生质变：“资本主义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也在很多方面发生了变化”。他們所說的社会主义方面的变化，我們留到下面再談。这里先說资本主义方面。《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卡德尔就是这个《綱領》的报告人）关于资本主义的变化，指出：由于社会主义力量在許多国家的新胜利和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由于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影响和作用，已“引起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变化”，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改变”。帝国主义仿佛已經变得馴良、和解、理智，“很容易受到劳动人民和民主群众的压力和社会影响”，不断“向工人阶级妥协和让步”。按照卡德尔的說法，所有这些虽然是被迫的，“但是，‘被迫’或者‘不被迫’——历史效果是相同的。正是这种类型的‘被迫’是历史的法则。”

遵照这种“历史的法则”，资本主义制度的改变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南共綱領》判定，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国家资本主义倾向的加强”。这个所謂“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国家壟断资本主义。卡德尔在关于《綱領》的报告中，除了特別指出国家资本主义的現象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典型特征”这一点以外，还解釋了为什么要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来代替“国家壟断资本主义”的概念，据說是由于“国家资本主义”这东西既存在于帝国主义国家，也存在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个概念可以“把所有这些过程都能概括起来”。卡德尔就是这样“应用概念上的灵活性”来誣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把它叫做“国家资本主

义”），美化帝国主义的国家壟断资本主义，把两种本质上全然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談。我們請讀者注意，在同一个《綱領》中，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断言：近几十年来馬克思主义思想“在闡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規律和矛盾方面”“落后于现代社会的发展”。这也就是說，他們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所說的一切，意义何等重大。他們厚顏无耻地自称要从这方面来填补馬克思主义理論的“空白”。

既然如此，就讓我們来看一下《綱領》中对于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所說的一些主要論点。卡德尔认为，有些批評家不怀好意，故意歪曲他們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分析，因此看一下《綱領》中的有关論点，就自然更有必要了。

《綱領》中关于“国家资本主义”这样写道：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遭受着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工人阶级在整个社会关系领域中施加的經常的自觉和自发的压力”；另一方面是“经济发展本身的压力”。这一切“引导社会将某些社会经济职能和生产資料日益国家化”，“国家把經濟中的重大作用夺取过来”。而“由私人資本轉給国家的某些經濟职能愈多，經濟中的新的、社会物质因素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压力就愈大”（《綱領》草案修改稿曾指出經濟中新的社会物质因素“就其客观趋向來說是社会主义的”）。——請看，资产阶级国家居然把資本家的經濟职能和生产資料夺取过来！！私人資本則把权力轉給了国家！！

\* 本文中凡引自《南共綱領》和卡德尔的小册子、报告中的一些話，其中的着重号均系引者所加。



《綱領》中又說：“在承担起重大的經濟职能的同时，国家和国家机器也就获得其独立的經濟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了国家机器的社会作用”。这个国家机构，“为获得其独立职能，为了把自己置于社会之上”，正在采取各种办法“限制私人資本的作用”，不断地“提高經濟民主发展程度”。

这样一来，我們终于看到了一种从未看到过的，独立的、超然于社会各階級利益之上的、对各階級一視同仁的、全民的资产階級“国家”了。美国总統肯尼迪在他的一九六二年《国情咨文》中曾特別提到，他的国家是“公民的仆人，而不是公民的主人”。原来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义者早已为这种說法作了“理論”的准备。照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义者說来，这种“国家”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都表現出了它的不可思議的神奇力量。

在国内方面。(1)国家就可以采取种种干涉措施，一方面，“部分地限制私人管理資本主义財產的权利”；另一方面，“生产者通过各种組織和或多或少的权利，影响企业管理和整个經濟管理机构”。(2)可以“通过限制管理私人資本和監督利潤分配，并在此条件下，加入一定的計劃經濟的因素”。(3)“国家在劳动关系和財產关系、社会权利和社会服务以及其他社会关系方面的(調节者的)作用也得到加强”。总之一句話：資本主义“通过某些經濟职能的国家化来改变其制度，从而使这一制度的私人資本主义基础日益削弱”。“典型的資本主义社会制度已經成为过去”了。

在国际方面。“国家直接参与的、区域性的和广泛的国际經濟組織的出現，是經濟

合作和协同一致的新形式，这种新形式同私人壟断資本过去在这方面的排他性活动不同，但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用来作为建立强者、发达者对于弱者、不发达者的經濟和政治霸权的新手段。”关于这一点，卡德尔在小册子中重申：不能“把典型帝国主义形式的‘資本輸出’同对不发达国家的有組織的国际援助混为一談”。讀者当然都能懂得，这里所謂“有組織的国际援助”，除了指美国直接組織的用来控制其他国家的“美援”和为美国壟断資本所控制用以推行其新殖民主义的机构，如世界銀行、国际货币基金組織、国际金融公司，以至美洲国家組織、爭取进步联盟、非洲經濟委员会等等，还能够是指什么呢？

最后，我們在《綱領》中讀到了这样的結論：“資本主义世界蓬勃发展的国家資本主义趋势极其明显地证明：人类正在通过各种途徑不可阻擋地深深地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

就是这样，“通过量的对比的变化”，帝国主义在南斯拉夫的“政治理論家和实践者的头脑中”，竟已达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质变”：这里完全是“新的”、“独立的”（超乎社会各階級利益之上的）国家上层建筑，和同样“新的”、（对于私人來說）“独立的”經濟基础，——这那里还是原来的資本帝国主义？这至少应当說已經是“人民資本主义”，或者簡直已經是“社会主义”了；而在对外方面呢，帝国主义則至少已是“国际援助主义”一类的东西了。

自从資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起，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之間关于帝国主义的本质、帝国主义的命运



等等問題，不斷地進行了爭論。資本主義在它自身範圍內會經歷不同的發展階段，每個階段都有某種變化。帝國主義就是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一個特殊階段。這種變化正如列寧所指出的並不是資本主義本質、本性的改變，“帝國主義是作為一般資本主義基本特性的發展和直接的繼續而成長起來的”。但修正主義者往往對這種變化持相反的看法。我們都還記得老修正主義者考茨基提出的所謂“超帝國主義論”。考茨基不承認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一個特殊階段，他認為這只不過是“財政資本的一種政策”（用來征服和吞併農業區域的）。他用這種說法來抹殺帝國主義所以為帝國主義的經濟基礎，即割裂帝國主義的政策和它的經濟之間的關係；按照這種說法，為了反對帝國主義，就只要去反對帝國主義的某種政策，而不必去變革決定帝國主義政策的經濟基礎（即帝國主義的社會經濟制度）。同時他又認為帝國主義作為各種政策中的一種政策，是可以改變的，只要把卡爾特爾政策應用到對外政策上，就會出現“各國財政資本間的相互鬥爭為聯合起來的國際財政資本對世界的共同剝削所代替”。這就會引起資本主義基本特性的變化。這就是所謂“超帝國主義”。考茨基確信：這種超帝國主義時代到來，帝國主義至少可以避免“道義上的破產”。列寧指出：這種說法掩飾帝國主義矛盾的深刻性和帝國主義產生革命危機的必然性，說得好像頭頭是道，“實際上卻等於更巧妙更隱蔽地（因此是更危險地）宣傳同帝國主義妥協”<sup>①</sup>。

現在，考茨基的所謂“超帝國主義”時代，

在現代修正主義者眼中，不僅已經完完全全地實現，而且遠遠地超過了。在卡德爾等人的眼中，由於世界力量對比的变化，特別由於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帝國主義的經濟基礎已經自動地發生了變化，資產階級國家成了反壟斷資本的力量，帝國主義對外擴張的必然性也已經不存在了；由於社會主義世界和資本主義世界的激烈矛盾，現在全世界資產者已真正聯合起來，帝國主義列強間的矛盾已經如此被削弱，以致我們在實踐中甚至可以不必去重視它。因此，《莫斯科聲明》中所謂隨着資本主義不平衡性的發展，各個帝國主義之間特別是新老殖民主義者之間瓜分資本主義世界的搏鬥更加尖銳化等等，不過是神話！不僅如此，過去的考茨基是說“聯合起來的國際財政資本對世界的共同剝削”，這裡還承認“剝削”；然而現在，卡德爾之流向我們指出的卻是帝國主義對不發達國家進行“有組織的國際援助”，而不是什麼剝削。在卡德爾之流的眼中，顯然已不僅出現了“超帝國主義”，而且還消失了其剝削的性質，成為“無剝削的”“超帝國主義”。——這一點，即在看待帝國主義的變化方面，現代修正主義者無疑比老修正主義者走得更遠了。

“人民資本主義”加上“無剝削的”“超帝國主義”，——這就是卡德爾根據新的世界力量對比向我們展示的資本主義社會發生“奇異質變”的一幅美妙圖景，這也就是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義者對於現代帝國主義特征所作的基本的描述。

<sup>①</sup>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63頁。



## 在“过渡”的掩盖下

卡德尔从上述的基本描述出发，向我们提出斗争策略、斗争形式的问题。他在关于《纲领》的报告中说，帝国主义状况的变化，向我们“指出工人阶级和一般社会主义力量在这样情况下利用来为夺取政权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作用而斗争的各种各样形式和方法”。

据说，现代修正主义者卡德尔之流是很重视斗争形式的，是很注意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的；但是可恶的“教条主义者”，“歪曲”列宁关于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矛盾的统一是相对的这个论点的含义。“列宁认为绝对的东西，就是运动”；而“教条主义者”所理解的绝对的东西，却“是在力量内部对比中发生各种量变时的矛盾的要素和形式的不变性”。

不对，尊敬的卡德尔先生！关于绝对的东西，列宁自己是这样说的：对立面的统一是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sup>①</sup>。请问，没有矛盾斗争的绝对性，怎么会有运动的绝对性呢？至于斗争的绝对性，当然不等于斗争形式的绝对性。矛盾的斗争是无条件的、永久的、绝对的，而斗争的形式则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斗争形式总是随斗争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一切都是极简单明了的。卡德尔为什么像害怕火一样害怕说出斗争的绝对性呢？卡德尔在这方面和我们纠缠，难道果真是为了重视革命斗争的形式问题吗？果真是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上的灵活性吗？

卡德尔的小册子和《南共纲领》以及卡德

尔关于《纲领》的报告，都以大量的篇幅谈到在“与列宁时代完全不同”的新条件下社会主义力量的斗争形式问题。他们所说的新条件，主要是指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变化。这里有必要指出，卡德尔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称作“过渡时期的典型现象”，这是想玩弄一个小小的手法。列宁曾经说过：垄断“是从资本主义制度进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过渡”<sup>②</sup>。列宁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列宁是说：帝国主义的垄断为社会主义准备了充分的物质前提，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这里，“过渡”的前提是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就是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由一般垄断进入到国家垄断的客观形势，更要求无产阶级加强这种革命斗争。但是，根据现代修正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特征的描述，事情却完全不是这样。在这里，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被认为“可以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在这里，好像是由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帮助，资本主义已经在向社会主义“过渡”，资产阶级“国家”已经为人们安排好“过渡”的一切成熟条件了。

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就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来谈论所谓“一般社会主义力量利用来为夺取政权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作用而

① 《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8页。

②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92页。





斗争的各种形式和方法”的。

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的《纲领》，关于这种“斗争形式和方法”写道：

“在目前，除劳动群众为解决有关他们日常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的问题而进行的直接日常斗争外，也提出了下列问题：国有化，以及生产资料和经济职能社会化的其他形式，企业管理和自治的各种形式，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民主的发展，劳动人民在生产和社会中的地位，工人、劳动人民和消费者参加经济管理机构和对它实行监督等。所有这些问题，作为争取加强工人阶级的社会影响、争取工人阶级统一、争取提高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觉悟的斗争形式，以及作为争取政权的斗争形式，对于整个工人运动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这里把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一切“诱人”目标都提出来了：去要求“国有化”吧！去设法把“生产资料和经济职能社会化”吧！去“参加企业管理和自治”吧！去进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吧！去“发展资产阶级民主”吧！去“参加经济管理机构和对它实行监督”吧！等等。卡德尔在关于《纲领》的报告中，把所有这一切叫做“革命和进化的统一”，也叫做“通过比较和平的进程进行的飞跃”，这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范围内，“工人阶级和主导的社会主义力量将采取一系列措施在政权和社会生活方面逐步争取和取得领导作用，并且逐步地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好一个“和平的渐进的飞跃”！但是，他独独没有提到无产阶级革命中最重要的东西，独独没有提到使无产阶级革命区别于资产阶级改良的东西，这就是：打碎资产阶级

国家机器，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以这作为目标进行革命斗争，并以这种精神训练、教育无产阶级群众。

让我们再读一读卡德尔小册子中所写的如下一段话吧！

“社会主义日益增长的力量、它的范例的说服力、社会主义关系对世界经济日益强大的物质影响，以及人们日益深刻地认识到再不能按老样子生活下去，都有力地加速着资本主义的崩溃过程，并不断迫使和刺激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力量向工人阶级妥协和让步。这同时也加强着工人阶级的地位，便于它比以往更顺利地利用议会斗争的手段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来加强其在社会上的政治影响和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要求和目标。最后，这也能使比各国共产党广泛得多的政治力量把建设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纲领接受下来。”

看，情形是多么美妙啊！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由于社会主义“范例的说服力”，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力量（当然指华尔街老板们、肯尼迪、戴高乐、阿登纳等等）就会不断地“向工人阶级妥协和让步”。这些统治力量迟早会膜拜在“范例”之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此，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完全不必要去进行什么革命斗争，完全不必要去准备打碎资产阶级反动国家机器，这一切都是无益的“冒险”，而只须等着资产阶级统治力量有一天在“范例”面前甘拜下风，自动退出统治地位就行了。同样由于这种“范例的说服力”，资本主义社会中“比各国共产党广泛得多的政治力量”（当然包括右



翼社会党人、各色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 统统都会“接受”社会主义纲领，大家都会争先恐后地“奔向”社会主义!!

说到社会主义国家的“范例”，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对于世界发展进程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革命和世界和平的堡垒。它们使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看到自己的希望和前途，鼓舞他们满怀信心地去进行反对垄断资本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和平的斗争，鼓舞他们以自己的革命行动去促使帝国主义制度垮台。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在斗争中能够期望愈来愈多地得到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支持(他们的革命斗争也极大地支持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和建设)。一句话，社会主义国家的范例当然不能够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但能够大大地鼓舞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但在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那里，我们看到的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范例”，不成为鼓舞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志的东西，而倒成了取消他们的革命斗争的一种借口；帝国主义制度的垮台，不是人民革命斗争的结果，而是社会主义“范例”存在的直接结果，因为据说“范例”能够“说服”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力量自愿让出阵地!!

卡德尔企图叫人们相信，一方面，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已使阶级力量对比、从而议会的作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另一方面，议会中已聚集着比共产党广泛得多的已接受了社会主义纲领的各方面的政治力量。这样，卡德尔就断言：资产阶级议会已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活力，更有希望，而工人阶级也就能

够比以往更顺利地运用议会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来“达到”社会主义的目标。

我们在这里读到的东西，对我们竟是如此之熟悉，以致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卡德尔等人今天向工人阶级推荐的，究竟是新策略呢，还是旧策略呢？这里需要简单地回顾一下工人运动历史中的某些事实。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那时还是“社会和平”时期，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就说：“在所有先进国家，资产阶级的特权在政治上正在不断向民主让步”。“现代各国的政治组织越是民主化，政治大灾变的必要和机会便越是减少。”到了一九〇五年，发生俄国第一次大革命，列宁指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直接行动开始了，但伯恩斯坦在同年所写的《政治性的群众罢工》一文中，却认为：“总会到来这样的一天，那时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如此强大，对整个社会将起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致于可以这样说，统治者的宫殿不再能抵挡工人阶级的压力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就自然而然地崩溃了。”稍后一点，他又在《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这篇文章中说：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影响的扩大，只有在发展资产阶级民主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它只是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结果。工人阶级要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必须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受良好的行政管理训练，为此，工人阶级应当去发展资产阶级的民主，通过选举斗争，展开“在公共的行政机构、合作社、市镇村、联邦、国家，以及在他们自己的自由行政团体中的、标志着我们时代的特征的强大活动”。



到了一九一七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事实宣布了伯恩斯坦之流观点的破产。但这种观点并没有被最后埋葬掉。十月革命后，考茨基在《唯物史观》一书中提出了一条所谓“人道主义与民主的道路”，直接与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道路相对抗。考茨基把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民主和人道主义，看作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唯一道路，要求工人阶级在走向这条道路上代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起领导作用。他号召工人阶级要“靠投票箱中的选票”把“政治决战”进行到底，而把粉碎资产阶级反动国家机器的策略，称为无政府主义的策略。考茨基认为，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才能达到真正自由的观点，是错误的，是把“唯物史观庸俗化”了。他认为，应当对资产阶级民主抱有信心，应当相信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可以采取民主手段迫使资产阶级实行革命的措施，认为议会的权力不仅仅决定于经济，“资本家在经济方面越来越强大，而无产阶级在政治方面越来越强大”，因此，议会中的优势终必属于无产阶级。

在考茨基说了这些话以来，继十月革命之后世界上又有一系列的<sup>①</sup>国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些胜利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正确，一次又一次地宣布了和十月革命道路相对立的一切机会主义、改良主义道路的破产。但是，上述的观点仍然没有被最后埋葬掉，它们仍不断地在新的情况下以稍许改变了的形式再现。“古典”的东西，往往穿着现代服装出现。我们在《南共綱

領》和卡德尔的小册子中看到的所谓“斗争形式和方法”之类，以及所谓“多样化的社会主义道路”之类，实际上就是这些东西。

有人似乎认为修正主义者是不崇奉“教条”的，他们是一切“教条”的反对者。其实不然，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正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修正主义教条。现代修正主义者对于老修正主义者的观点，表现了何等忠诚不渝的态度啊！

卡德尔等人也许要争辩说，他们不是也三番五次地提到“夺取政权”（或者叫做“夺取政治领导权”），并且把这一点提到重要的地位吗？是的，夺取政权之类的话，在他们的言论中是可以找到的。但是，这类语言不是同样可以在老修正主义者的言论中找到吗？关于怎样夺取政权，考茨基在一九一二年所写的《新策略》这篇文章中就说过：“我们政治斗争的目标，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驾于政府之上的主宰”。看，这是怎样一种“新策略”啊！列宁在批评第二国际领导人物王德威尔得时，也曾指出：“他同考茨基一样，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除了资产阶级完全不能接受的以外，除了区别革命者和改良主义者的以外，什么都引用。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话，他说过不知多少，因为这一点已由实际活动引进纯粹的议会斗争范围内去了。”但是，“工人阶级不能单纯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应当打碎这个机器。关于这一点，他却一字不提！”<sup>①</sup>一切新老修正

①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01页。



主义者恰恰都迴避了這個問題。

实际上，資產階級對於工人階級遵照法律（當然是資產階級的法律）、通過議會來“奪取政權”，是並不懼怕的。資產階級政治家都懂得：只要是在資產階級掌握着國家機器的條件下，所謂自由選舉的“自由”總是掌握在他們手里，他們可以“自由地”擺布一切，可以完全隨自己的意，“自由地”施舍給工人階級和共產黨人幾個議員席位，不願意的時候也可以一個席位不施舍，甚至連生存權利也不給（肯尼迪和華爾街老板們對於美國共產黨就是這樣）。而如果有那麼一個機緣使共產黨人在議會中占據了一時的多數，他們也完全可以“自由地”修改選舉法或採取其他措施，把共產黨人趕出多數地位，而使他們的任何一點優勢（即使僅僅是某種數量上的優勢）都喪失干淨。

毫無疑義，無產階級政黨應當利用各種可能的機會參加必要的議會鬥爭。只要有此可能，共產主义者應當像列寧所指出的，“經常不斷地、不屈不撓地、毫不放鬆地利用議會選舉”<sup>①</sup>，避免偏狹的宗派主義和革命空談。但是，這裡作為一個嚴重問題向我們提出來的是：工人階級應當把自己的目標集中在那一點上？工人階級只有正確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才能够從長遠的根本的利益着眼，正確地運用各種鬥爭手段，其中包括議會鬥爭的手段。也只有正確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才能够從議會鬥爭方面做到像列寧所說的：“創造一種新的、異乎尋常的、非機會主義的、不貪圖祿位的議會活動方式”，而避免成為“用學者口吻跟民眾說話”、不惜任

何代價“追求議會的‘肥缺’”<sup>②</sup>的工人貴族政客。

卡德爾之流向我們指出，似乎由於資產階級“國家”的幫助，社會已經穩穩地進入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了。這自然不過是一派鬼話。卡德爾在哲學上，害怕說出鬥爭的絕對性，而只談運動的絕對性，並且談什麼和平的、漸進的“飛躍”。在政治上，他避開真正的革命鬥爭問題而侈談什麼“過渡”。很显然，卡德爾的所謂“過渡”，實際上就是不過渡，就是反對過渡。

列寧說：資本主義總是要過渡到社會主義去，但是作為這種過渡的特徵的，不是什麼依靠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而“恰恰就是推翻資產階級、打碎和摧毀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革命”<sup>③</sup>。列寧這話，是在批評第二國際叛徒考茨基等人時說的。當時這些叛徒們也談論某種“過渡階段”，談論奪取政權，甚至談論無產階級專政，但是竭力掩蓋資產階級國家的階級實質，並拒絕實行真正革命的路綫。所以列寧說，他們“談論無產階級專政是為了拒絕這個專政”<sup>④</sup>。列寧指出，這些叛徒在理論上哲學上是用折衷主義和詭辯術來代替辯證法。“折衷主义者不要‘過於絕對的’論斷，為的是暗中貫徹市儈庸人的希望：用‘過渡階段’代替革命。”又說：“辯證法是具體的和革命的，……考茨基分子和王德威爾

①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9頁。

② 同上書，第80頁。

③ 《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寧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04頁。

④ 同上書，第301頁。



得分子的折衷主义和诡辩术，为了迎合资产阶级，抹杀了阶级斗争中一切具体的和确切的东西，提出‘过渡’这个一般概念来掩盖（现在十分之九的正式社会民主党人都借此

掩盖）背弃革命的行为！”<sup>①</sup>

列宁当年用来批评考茨基分子的这些话，今天拿来批评卡德尔之流，不是很恰当的吗？

### 如此“质的对比的变化”！

卡德尔等人一方面把现代资本主义描绘成仿佛已深深地进入了社会主义，或者简直已等于社会主义，而另一方面又把社会主义描绘成仿佛就是资本主义，或者甚至比资本主义更坏些。卡德尔哲学中的所谓“质的对比的变化”，就是指此而言。

卡德尔等人反对对于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过于绝对”的论断。在他们看来，对立着的矛盾双方，这一方具有那一方的特征，那一方也具有这一方的特征，没有什么本质差别；资本主义未必坏，社会主义也未必好，一切都不是绝对的。本世纪三十年代，考茨基在《布尔什维克的死路》一文中，曾经攻击布尔什维克，说“布尔什维克以马克思的结论为根据，却丝毫不理解马克思的方法。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没有一件事是绝对的；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大农场对于小农场的优越性不是绝对的”。考茨基这话是用来攻击当时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历来的修正主义者，在哲学上往往借口“反对绝对主义”而兜售相对主义的诡辩术，并且往往只抓住了事物的某些外表的东西，而抽掉了事物的本质的东西，其目的是为了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抹杀一切原则界限，抹杀事物的本质差别。

照卡德尔等人看来，虽然资本主义和社

会主义是有区别的，但是，目前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从属于它本身以外的因素的压力”，这就是说它的发展已经从属于它内部正在逐渐积累的由国家壟断资本主义提供的“新的社会主义因素”；反过来，社会主义的发展则从属于包含于其中的“资本主义旧因素”。他们怎样来说明这种谬论呢？现代修正主义者一般是从国家政权着手。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成了保障一切阶级和全体公民的利益的东西，它具有“改革资本主义结构”的巨大能力，而这种能力又产生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巨大可能性，——资本主义的情形岂不美妙！而社会主义的情形恰好相反。按照修正主义者的描绘，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简直是万恶之源，“国家”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因素，只要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存在，那末，什么“国家雇佣关系”呀，“国家极权主义”呀，“官僚国家主义”呀，“霸权主义”呀，“个人迷信”呀等等东西，终必相伴而存在。

当然，诸如此类的诡辩，也并不是现代修正主义者所独创。过去的修正主义者，历来颂扬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把它当作社会主

<sup>①</sup>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04—305页。



义的发源地；而当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出现以后，他们又不断地咒骂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考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文（读者从文章的题目就可以猜出其全部内容），攻击列宁所提“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相一致”的论点，说无产阶级专政只是“意味着个别人对群众的无限权势”，“列宁企图玩弄手法使这种强制成为可以接受的东西”。伯恩斯坦在这个国家成立四周年的时候，在《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也做出结论说：“几乎没有第二个国家在国家和工业方面存在着这样多的官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实际上奴役无产阶级”。

十月革命缔造了一种“残酷的”“官僚统治制度”，然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在这种“残酷的”“官僚统治制度”下建立起来，——这就是十月革命以来，我们一直从新老修正主义者那里听到的他们的共同语言。

这次，卡德尔在他的小册子中运用同样的方法攻击社会主义，主要集中在战争问题上（当然又是和国家政权相联系的）。他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国家“好战”。为了进行这种诽谤，他煞费苦心地歪曲现代战争的根源。

《莫斯科声明》关于战争的根源这样指出：“战争是资本主义的经常伴侣。人剥削人的制度和人屠杀人的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两个方面。”正如列宁所说：“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战争无非是政策的另一种’（即暴力）‘方式的继续’”<sup>①</sup>。现代战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由于国际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依靠当代维护和平的强大力量的联合斗争，新的世界大战是可以防止的，

不能说，世界大战在任何条件下都注定不可避免。但是，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也总是存在的，因此同样不能说，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已经过去。实际上，帝国主义仍在“顽固地准备着世界战争”。这里是两种可能性，而不是一种可能性。这些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战争问题的基本论断。

卡德尔提出了什么论据来和这些正确论断相对抗呢？他在这里气势汹汹地反对所谓“过于绝对”的论断，把事情说成这样，仿佛列宁从来没有明确提过现代战争的根源必须到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去找寻。他说：“当列宁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因素不可避免地‘产生’战争，因而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时候，他所指的正是这样一种力量对比，在这种对比中，这些帝国主义因素无限制地占据统治地位，或者至少是占上风。”卡德尔企图由此证明，当“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时，战争的根源就不能再从帝国主义方面去找了。

卡德尔决意把战争根源问题搅混，这不是一件寻常事，他这样做是企图从一方面，即从帝国主义方面，掩盖战争的真正根源，而从另一方面，即从社会主义国家方面，找寻“战争的根源”。

卡德尔是怎样到社会主义内部去探寻“战争的根源”的呢？

卡德尔公然抹杀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和平性质。他装作好像完全不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不会、绝不允

<sup>①</sup>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5页。



許放棄自己支持各国人民革命的国际主义义务，同时，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絕不会、絕不允許把社会主义强加于別国的人民，因为任何革命总是各国内部发展的結果，革命总是由各国人民自主地进行的。卡德尔企图叫人相信，仿佛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一种企图，这就是“通过战争从外部把社会主义强加于其他国家的人民”。他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对一場反动战争負責。”卡德尔不仅作出这种恶毒的誹謗，并且从“理論”上作出如下的論断：现代侵略战争已不能简单地說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繼續了，它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企图“以战争的方法使社会主义征服世界的政策”的繼續，特別当“社会主义制度已經成为世界力量”的时候是如此。这里，卡德尔又把問題归結到“力量对比”上。他是这样說明問題的：在过去，由于“帝国主义无限制地占据統治地位，或者至少是占上風”，所以它們有发动战争的可能；現在，社会主义力量已日益超过帝国主义力量，帝国主义已不是“无限制”的了，因此它們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已不存在，它們只剩下了一个目的，就是“自卫”。而社会主义国家呢，因为它們在力量上日益占优势，它們自感力量强大，所以总想“以战争来促进世界革命”。因此，在目前來說，“战争已經不再只取决于資本主义的內部发展法則，而且也取决于社会主义的內部发展法則”，等等。

这个卡德尔，在作出这种惊人荒誕的編造以后，就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来指責說，这是“托洛茨基主义”，是“現代形式的波拿巴主义”。这样一来，他自以为完成了一件不

朽的“理論”功业：从新的力量对比出发，他已創造了一种“新”的“战争根源”理論！

但是，这个自視甚高的卡德尔，居然沒有意識到他的这种苦心編造实在算不得什么“創造”，資產階級政治家和新聞記者編造这种謔言已經有四十多年之久了。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現时起，資產階級就沒有一天停止过宣傳“社会主义国家企图用强力輸出革命”，各国共产党是“外国代理人”等謔調。这里随便举个例子。一九五八年，美国資產階級政論家李普曼在訪苏以后，写了一本叫做《共产主义世界和我們的世界》的小册子，其中着重宣傳什么“在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共产党政权”，是苏联“在对納粹德国作战时期由于軍事征服而强加給这些国家的”，并且是“由苏联的軍事占領”来維持的。我們如果把卡德尔的小册子和李普曼的小册子对照讀一下，就不难看出，卡德尔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攻击，只算是拾了李普曼等資產階級評論家的一点余唾，不过稍加一点“理論化”而已。

糟糕的是，正当卡德尔先生自以为完成了一項“理論”功业而洋洋得意的时候，他的主子却在一場談話中把奴才所苦心經營的不可告人的东西，全盘托出来了。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美国总统肯尼迪接見苏联《消息报》总編輯阿朱別伊。这个总统在談話中指出：現在的世界局势，“麻煩是由于苏联力图在某种意义上使全世界共产主义化所产生的”，正是苏联“那种把共产主义制度向一国又一国推行的努力，构成了对和平的巨大威胁”。这个总统还說：“我



們所反对的是企图用武力把共产主义强加于人，……我們曾經以为，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为东欧人民提供了自由选择。照我們看来，今天他們并没有自由选择。”在这个总统看来，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苏联必須停止“用武力把共产主义强加于人”，这样才能有世界和平。

肯尼迪这話当然完全是混淆是非，顛倒黑白，但他的意思倒是明明白白：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由苏联企图把共产主义从外部强加于人而引起的，要和平，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就不許革命；苏联如果有和平共处的誠意，就应当只顧“保护它本国的利益”，“保护它本国的安全”，而不許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且这样做还不够，还要为东欧人民提供“自由选择”，即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恢复资本主义制度。

肯尼迪的談話暴露了美帝国主义的野心勃勃的全球战略計划，而这就向全世界泄露了現代修正主义者找寻“新的战争根源”的真情实意：原来他們这样做是为了阻止各国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阻撓世界人民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对于资本主义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持，使人們

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奴役政策面前屈服让步。新的世界力量对比越来越有利于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不利于帝国主义。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現代修正主义者肆无忌惮地誹謗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把它叫做“把社会主义强加于人”），并且居然把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看作是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污蔑和向帝国主义投降的根据（而不是把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作为决定新的革命行动的根据）。所有这一切，都突出地表明了現代修正主义者如何死心塌地地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

这样，我們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卡德尔要特別咬牙切齿地誣蔑中国人民“好战”。如《莫斯科声明》所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給帝国主义在亚洲的障地以毁灭性的打击，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世界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而且，“它給民族解放运动以新的有力的推动，給各国人民，特别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以巨大的影响”。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十分害怕这种影响，它們千方百計企图“遏制中国的影响”。現代修正主义者誣蔑中国人民“好战”，只不过是适应帝国主义这种需要而已。

### 現代政治的“絕对的”、“最高的”范畴

卡德尔毕竟是一个替帝国主义服务的老手，他在小册子中陈述自己的观点时，曾几次装作坦然地說：这样，你們大概以为“我又在美化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了吧？但一忽儿又故作惊讶，仿佛对于人們批評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义的叛卖政策（特别是所謂“积极

共处”政策）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积极共处”政策“突然間获得了这般神奇的修正主义

- 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不仅害怕中国革命的影响，而且害怕古巴革命的影响，它們现在也正在大声叫嚣着“古巴企图把这个革命强加給其他国家”。





力量”？接着他又扮出一副哲学家教训人的面孔：你们只懂得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对立面的统一是相对的，却忘记了列宁所说的：“在（客观的）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的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说来，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的。”

卡德尔在这里显然是弄糊涂了，他完全不懂得在这个具体场合即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问题上，所谓“相对中有绝对”究竟是什么意思，他竟然没有理会列宁这段话在这里恰恰是反对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自己的。

在这个问题上，卡德尔是这样提起话头的：“我们把自己的政策叫做积极共处政策的这个事实，是使中国的理论家得以区分‘修正主义’共处和‘非修正主义’共处的‘侥幸’情况。‘积极’一词竟成了关于南斯拉夫共处概念的修正主义性质有别于某种其他‘真正的’或‘正确的’共处政策的各种空谈的对象。”使卡德尔深感遗憾的是，甚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批评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某些批评家也参与了中国的这种歪曲”。卡德尔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他认为事实是，差别“不在于对共处的‘质’的理解”，而在于：在南斯拉夫，共处政策是“社会主义国际政策中持久的、原则性的因素”；在中国，共处只是“过渡性的和暂时的”。

完全不对，卡德尔先生！事情恰恰相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世界上只要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存在，和平共处的政策总是需要的，它总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不

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不管世界力量对比如何。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止一次地说过，而且事实也不止一次地证明，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方面是没有障碍的，障碍从来是在帝国主义方面。因此，差别完全不在暂时性或非暂时性、策略性或非策略性上，差别恰恰在于卡德尔竭力回避的“对共处的‘质’的理解”上。《莫斯科声明》指出：“各国间的和平共处，并不像修正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意味着放棄阶级斗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间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请看，人们对于共处的理解不是有着质的差别吗？由于人们对共处和阶级斗争的关系的态度不同，因此实际上区分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处和修正主义的共处这两种原则上不同的共处政策来，这难道不是完全合乎逻辑（而决非“侥幸”）的情况吗？

卡德尔竭力为之掩饰的南斯拉夫共处概念的修正主义性质，恰恰在于：排斥阶级斗争，排斥革命，把和平共处同阶级斗争和革命绝对对立起来。这就是把两种本来处于对立统一关系的东西加以割裂，使两者都片面地绝对化起来，使一方排斥另一方，一个原则排斥另一个原则。这是一种典型的诡辩方法。黑格尔曾说过：“诡辩的本质乃在于承认孤立的片面的抽象原则本身即是对的，只要这原则能够适合个人当时特殊情形下的利益”<sup>①</sup>。这就是孤立地片面地抓住某个原则，排斥其他的原则，以替自己的某种特

① 《小逻辑》，三联书店1951年版，第188页。



殊需要辯护。

在修正主义者那里，用这种方法反对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不乏先例。如伯恩斯坦、考茨基等都會把民主和专政绝对对立起来，提出排斥阶级斗争、排斥专政的所謂“純粹民主”。他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借此否认资产阶级民主的专政实质（资产阶级民主对人口中的大多数、对广大劳动群众来说是反动的专政），同时抹杀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实质（无产阶级专政对人口中的大多数、对广大劳动群众来说是真正的最广泛的民主）。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也以同样的方法，倡导一种不要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所謂“积极共处”。在他們那里，“积极共处”是现代国际政治的绝对的、最高的范畴，它超越于斗争和一切革命之上，一切革命的利益都必须从属于它。所謂共处就是全面的、无条件的国际阶级合作和民族合作。这里没有什么国际阶级斗争（或者在这种斗争中只有意識形态方面的斗争而没有政治斗争），也没有什么反对帝国主义奴役的民族解放斗争。另一方面，当他們談到斗争时，却又把斗争的概念歪曲得不成样子，仿佛只要一提革命斗争就是“想以武力解决世界革命問題”。这种绝对論，甚至把一切斗争都牵强附会地（因此也必然荒謬絕倫地）申引到能够破坏和平共处。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点斗争，甚至在远离帝国主义的地方发生反对帝国主义罪行的示威游行，如貝尔格莱德工人举行抗議美国主使謀害剛果民族領袖卢蒙巴的罪行的游行，他們都提心吊胆，唯恐得罪了帝国主义老爷，因此，也要加以“破坏共处”的罪

名。这种绝对論，实际上不可避免地把他們自己放在反对革命（因而也必然反对辩证法）的立場上。

修正主义者本能地厌恶辩证法。卡德尔虽然口头上反对“是——是和否——否”的公式（他为此引用了恩格斯的一长段話），但他看問題实际上浸透了这一公式的精神，即浸透了形而上学精神：要就是无条件的（不惜一切代价的）和平共处，要就是沒有和平共处。他把事情說成这样：仿佛承认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揭露美帝国主义采取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这是同共处的概念对立的、不相容的，如果說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如果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那就等于說“共处就是不现实的臆造和幻想”，也就是“证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据說为了共处，为了增强共处的信心，就必须不反对和不揭露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就必须用橄欖枝把美帝国主义当作“和平之神”裝飾起来。这当然是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观点。无条件的和平共处是錯誤的、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因为这实际上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不断迎合、不断妥协、不断让步，其結果只能使和平共处变成其自身的对立面（即不能真正达到和平共处）。当我们指出这一点的时候，这个卡德尔，总是悻悻然地向我們提出責难：你們把共处看成是“过渡性的和策略性的”！你們“要战争而不要共处”！你們不是“真誠的共处論者”！等等，等等。修正主义者习惯于形而上学的思維方法，对于一切問題都是从抽象的“要就是这——要就是那”的



观点来判断的，因此，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他们除了玩弄一般的、抽象的詞句和发出誣蔑性的責难外，提不出任何有严肃意义的結論或者論据来。

把辯证法原理应用于和平共处，必然而且只能像《莫斯科声明》那样得出結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是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間的階級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什么超階級斗争的东西。这里重要的是要找寻恰当的斗争方法，向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群众宣傳以斗争求和平共处的理論，而不是一味宣傳妥协让步的理論，不能一味制造幻想，磨灭階級斗争的鋒芒。《声明》說：“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出現着有助于在資本主义国家中开展階級斗争、殖民地和附屬国人民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可能性。同时，革命的階級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成就又促进和平共处的巩固”。不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奴役、粗暴干涉內政及战争政策，就不可能爭得真正的或者稍微巩固的和平共处。历史的辯证法就是这样的。是否用这种观点看問題，这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在和平共处問題上的分水岭。这里无疑存在着质的差别。

卡德尔在书中对于他們的“积极共处”政策受到进步的世界輿論的指責一事，表示一种委屈心情。他竭力表白，似乎“积极共处”政策也是讲斗争的，也不主張在“国际关系中維持現状”，并且在任何情况下无意排除“国际階級斗争”。一句話，他們是“真誠的馬克思主义者”，只是因为他們不承认“資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所以不公平地被人歧視了。多么

无辜啊！事情真是这样嗎？当然不是。階級斗争总是有具体的和确定的內容的。在今天这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我們在国际范圍内，为和平、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而斗争，就应当：

- 加强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结和力量；
- 积极支持民族解放斗争；
- 积极支持資本主义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 爭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反对和不断揭露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毫无疑义，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从我們时代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争的全局及其基本內容，来規定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或国际政策，来观察和处理作为这种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但不是唯一內容）的和平共处問題。

可怜のカ德尔先生，只会喃喃地叨念什么“国际階級斗争”就是“把对世界进行革命改造的一切社会內部过程統一和互相联系起来”这一类含糊不清的空洞的可疑的口号，却不敢絲毫触及这个斗争中的这一切“具体的和确切的東西”。相反地，他們是站在这些東西的对面，来反对这些東西。

社会主义陣营国家的团结一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是和平的根本保障。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义者的“积极共处”，反对所謂“集团的排他性”，首先攻击的就是这个社会主义陣营。在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义者眼中，現时代的特点是：整个世界已进入



了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改造的统一过程”，并且由于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社会主义甚至“已经不再需要维护它自身的存在了”（卡德尔）。照铁托的说法：把世界划分为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这就是破坏“统一的世界性过程”，“这将不是什么共处，而只是某种包含着各种新冲突的危险的休战”<sup>①</sup>。现代修正主义把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看作眼中钉。最近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杂志（第五、六期合刊）所载《苏共二十二大》一文，再次露骨地攻击所谓“阵营”政策，说什么“阵营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一致”，是必须予以抛弃的“斯大林政策留给国际工人运动的范畴之一”。文章攻击共产党工人党两次莫斯科会议，认为用“内部会议方法”制订统一纲领，“阻挠更彻底地清算许多保守的、教条主义的主张和观点”，并且剥夺各国共产党人的行动自由。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向帝国主义献媚和乞求和平，不断地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造谣中伤、挑拨离间、内部颠覆等阴谋。无怪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最近在为美国“援助”南斯拉夫辩护时也公开承认，美国从铁托集团的“积极共处”政策中认识到“深切的利益”。

现代修正主义者卡德尔之流，口头上也说不喜欢帝国主义，但同时又以一种十几岁孩子的天真态度，企图叫人相信，仿佛我们揭露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说明必须对帝国主义抱有警惕性，我们就不能成为“真诚的”、“积极的”共处论者了；另一方面，又企图叫那些中立国家相信，仿佛他们把美帝国主义作为世界人民的最凶恶的共同敌人来反对，

他们也就不能成为“真诚的”、“积极的”中立论者了。我们请读者特别注意这件事：现代修正主义者这种奇怪的“逻辑”，恰恰产生在这样的事实面前：美帝国主义正在积极准备进行新的世界战争，核战争和常规战争，而且，正在加紧准备进行旨在对付民族解放运动的所谓“特种战争”，企图将这种战争强加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被压迫人民身上。这甚至是美帝国主义不止一次地公开宣布的政策。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群众的革命浪潮不断高涨这个事实，说明世界革命运动是阻挡不了的。这些地区的人口，占资本主义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如此广大的人民站到反对帝国主义方面来，意味着帝国主义的寿命不长了。一切人，不管他们在口头上替自己宣布什么，都将在这个革命浪潮面前受到考验。在这个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面前，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扮演着什么角色呢？他们或者像怕火的毛毛虫一样蜷缩在一边，最多不过搭讪着附和几句口号，或者利用一切机会来替帝国主义及其各种代表人物散布幻想，企图叫被压迫人民妥协让步，竭力阻止革命斗争的发展。他们最惯用的手法，是用核战争的危险来对起来斗争的人民施以恫吓，企图叫被压迫民族放下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旗帜。为了这一点，近年以来，被美国报纸称为“一个小国的大人物”的铁托本人，曾不辞劳苦，仆仆亚非道上，为美帝国主义进行游说。

以上等等，就是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

<sup>①</sup> 铁托：《1958年新年文告》。



者所謂“斗争”的主要内容。

美国的进步评论家詹姆斯·艾倫，写了《原子帝国主义》一书，其中有一段话说得很好：“原子时代的世界帝国主义已被我们这一时代的社会主义的变革和殖民地革命大大地限制住了，不仅在地理上如此，而且在那些影响各地人民的思想的领域内也是如此。原子帝国主义就存在于这种特殊的情况中，这就是它的致命的弱点以及无法超越的困难的根源。就是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一个孤立的、贮满原子武器的堡垒也不能阻擋这种形势”。

任何一个尊重事实的人都看得清楚的东西，对于自命为深懂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卡德尔先生，看来是不能理解的。

列宁的确说过：“对于客观的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说来，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的。”<sup>①</sup>这段话应用到和平共处问题上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可以解释一下，这就是说：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说来，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不是排斥阶级斗争的，不是无条件的，和平共处之中有斗争；而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说来，共处就是共处，是排斥斗争的。

卡德尔高谈辩证法，并且企图借重于列宁。但实际情况恰恰是又一次证明了列宁所说的：修正主义者对于革命的辩证法是一窍不通的。

### 修正主义诡辩的两个特点

现在我们可以专就哲学方面，总括地说几句了。

列宁在批评第二国际的老修正主义者时，曾说过：在修正主义者那里，“辩证法正在变成最卑鄙最下贱的诡辩术！”<sup>②</sup>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这方面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帝国主义愈到后来愈衰落、愈凶暴，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修正主义的诡辩，也是愈到后来愈卑鄙、愈下贱。目前的形势是：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在这种形势下，修正主义者要为帝国主义辩护，要阻撓被压迫人民的革命，要颠倒事情的黑白，例如把垄断资本用来加强自己的力量和国家资本主义，说成是反对垄断资本的东西，把社会主义国家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行动，说成是“托洛茨基主义”等等，自然就要采取各种下贱的手段，更卑鄙地践踏马克思

列宁主义各项原则。修正主义的哲学根源总的说来是唯心主义的相对主义，否认真理的客观性，抹杀一切原则界限，认为好和坏、是和非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没有客观标准的；在有些场合，则又把某种相对的东西绝对化，在这种场合，他们是绝对的相对主义者。卡德尔用绝对相对、量变质变等范畴来和我们纠缠，不仅没有捞到什么，反而恰恰暴露了自己的丑恶的精神面目。

修正主义的相对主义诡辩，一般说来，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列宁说，修正主义政策的特点是：“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

① 《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8页。

②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11页。



动,忘記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記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謀取实际的或可以設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sup>①</sup>。修正主义者需要有一种能够为他们这种政策作辯护的东西,在他们說来也叫做“理論”。这种东西或者这种“理論”,要能够做到:使人們的眼光不去注意根本的东西、作为长远目标的东西,看不到斗争的全局,忘掉世界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而只是在眼前利益中打轉,满足于眼前的某种现实利益,以某种自私狭隘的利益代替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并且以这些作为衡量真理的标准。当某种事物(或局势)稍有变动,或者出現了一些新条件(远不是决定本质东西的根本条件的变化),他们就赶忙宣称根本情况变了,“量的对比的变化”已引起“质的对比的变化”。当资本主义由一般壟断进到国家壟断,帝国主义在世界力量对比中日益居于劣势,他们就赶忙宣称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的本质变了。他们完全按照某种主观需要,某种一时的可以設想的利益,决定問題,要求政策能够迅速适应这种設想中的变化。今天适应这种变化,明天又适应那种变化。今天把一种东西捧上了天,明天又把同一种东西打入地狱。他们随波逐流,自称能够看到每一个稍微“新穎的問題”,只是不要原則,不要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理論”的任务是叫人相信:仿佛只有这样才是“灵活的”、“创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够真正表现真理的“具体性”(他们完全不懂得真理的具体性首先表现在真理的全面性上)。

为了达到这样一种目的,他们特別选中

了辯证法。但他们“运用”辯证法,不是为了对事物求得全面的本质的認識,不是去找寻事物的客观发展規律,不是为了革命的利益,而是为了利用辯证法的名义、利用“灵活性”的名义,偷換概念,玩弄字句,达到詭辯的目的。列宁說:“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就是問題的实质所在。这种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折衷主义与詭辯。”<sup>②</sup>在修正主义者那里,我們看不到邏輯的任何一貫性,他们有的只是前后矛盾。一切都是从他们的需要出发、从他们的方便出发。上面我們已經看到,只要能够适合修正主义者歪曲事实、歪曲真理的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他们可以在这一場合是相对主义,装作好像是反对形而上学的,在另一場合又是绝对主义,装作好像又是反对相对主义的。总之,什么对他们方便,他们就利用什么。因为在他们眼中一切都是沒有客观标准的。修正主义者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需要,也就是某种效用。这一点,修正主义是和实用主义相通的。所以一切修正主义者天生具有(用卡德爾的話來說)“实用主义的政治道德”。

修正主义詭辯的另一特点,就是折衷主义。修正主义者总是要把自己打扮成为馬克思列宁主义者(馬克思列宁主义愈获得胜利,他们愈要这样),但他们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服务的。因此,他们总是把各种原則上不同的思想观点杂乱地糾合在一起,拌成一堆“大杂燴”,把一切弄成模糊的、曖昧不

<sup>①</sup> 《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頁。

<sup>②</sup> 《黑格尔〈邏輯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12頁。



清的、不具体的，借此偷运修正主义、唯心主义的货色。折衷主义的妙用就在于“混水摸鱼”。列宁说：“把马克思主义偷偷地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騙群众的。这样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各方面的矛盾的影响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发展过程做出任何完整的革命分析。”<sup>①</sup>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也是玩弄这种折衷主义的能手。一方面，不主张在国际关系中维持现状，另一方面，反对任何触动帝国主义利益的革命。一方面，声言经济职能的国家化不触动资本主义基础本身，另一方面，否定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性，把它描绘成为关注全民福利、保证社会和谐、“超阶级”的独立机构。一方面，竭力证明现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改变了它原来的对外掠夺的性质而成为一种“国际援助”的力量，另一方面，附带地也说到它也可能成为“强者对弱者建立政治霸权的新手段”。他们在总的方面宣扬资本主义制度自动改革论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论，但在个别地方也表示不同意把议会斗争形式绝对化。他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但在《纲领》中仍写下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名词”（诚如列宁所说，他们“谈论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拒绝这个专政”）。他们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国家“好战”，但在某种场合也谈到“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压力”，如此等等。修正主义者的这种折衷主义把戏，有人称之为玩弄“思想跷板”，它适合诡辩的需要。在卡德尔，他却一本正经地把这叫做“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因为竭力玩弄折衷主义的把戏，现代修正主义者卡德尔之流就活像狄德罗的哲学小说《拉摩的怪儿》中的主人翁一样，总是在同一段时间内唱着各种矛盾的曲调和扮演各种矛盾的角色。他把三十个曲子，意大利的、法兰西的，悲剧的、喜剧的，各种各样的，杂乱地混在一起，一忽儿唱着深沉的低音，好像一直降落到地狱底下；一忽儿又用假嗓高唱起来，好像把高空撕裂了一样。一忽儿是一个深受委屈的年轻姑娘，猩猩作态；一忽儿成了一个宣扬“创造性教义”的教主，神气十足；一忽儿又是一个奴仆，百依百顺。不同的是，拉摩虽然具有寄食者的一切恶劣品质：对主人卑躬屈节、阿谀逢迎，对别人神气活现、虚伪欺詐、挑撥离间，但同时他又非常痛恨这些品质。卡德尔则不然，他并不痛恨自己身上的这些东西，相反，他把这一切看成是“美德”。

在受美帝国主义豢养的各种走卒中，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是与众不同的，他们对于美帝国主义有特殊的价值，所以美帝国主义给予了特别的奖赏。一九六一年九月三十日美国《星期六晚邮报》算了一笔账，说十多年来美国一共“援助”了南斯拉夫铁托集团几十亿美元，结果怎样呢？“我们迄今为止已经获得了我们的金钱的价值”，同获得的好处比较起来，几十亿美元“并不算是太高的代价”云云。

真是一桩双方都有厚利的交易！在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那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这样地被拖入一个非常肮脏的政治交易中去！

<sup>①</sup>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87页。

